

# 当前军事工作的几个问题<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

## 一、干部问题。

军队员额压缩后，师以上的干部退下来不能要求国务院安置解决。营团干部主要是进学校学习，有一些也可以转业到地方企业部门工作，不懂可以学习嘛。连排干部主要是转到农村，可以在公社当干部，也可以转到工厂去。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干部互相调换问题，毛主席讲了好多年了，还没有执行。部队也要互相调防。现在有的干部和有些部队陷入了派性，凡是陷到派性里的一定要调出来，各地区可以对调。这个问题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sup>〔2〕</sup>后，毛主席又有指示，现在没有落实。省军区、大军区、军兵种的干部，都要互调。干部要换换地方，部队也要换换地方。总参、总政要搞个计划出来。

## 二、体制问题。

机关要搞个编制表出来，不能一下子搞得太严了，但是要搞个编制表，将来按编制表办事。部队体制有我们的老传统，可以考虑几种形式，不要千篇一律。例如，一个师可以编两个大团、一个小团，也可以编一个大团、两个小团，也可以编三个小团。平时编制和战时扩编要统一考虑，如一个军打起仗来就不是三个师，可扩编成五个师。一个军就成为一个集团军，打起仗来作为战役单位，能单独作战。战时在什么地方扩编，

现在就要有计划，指定一个专区、两个专区，平时挂上钩，战时就可以就地扩编。装备也要就地储备。基层干部转业也以那个地区为主。总之，部队平时编制要和战时动员计划结合起来统一考虑。总部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搞个方案出来。

现在机关庞大，机构重叠。总后机关很庞大，总参机关也庞大。总政人数少些，但机关也比较大。精简主要是减机关和保障分队，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加一点。当然，还没有装备的也不能空架子等着。

### 三、军工生产问题。

要搞一个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考虑规划要从实际出发，看看实现的可能性。一是国家能不能拿出那么多钱，二是能不能生产那么多。

我参加军委工作后主要抓两件事，一是抓工事，二是抓弹药。我们的作战方针是打歼灭战。战争开始，先要利用工事消耗敌人，利用广大的地区和工事，大量杀伤敌人，削弱敌人，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要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没有工事，削弱不了敌人；让它长驱直入，歼灭战就打不了。现在有些地方工事还没有做好，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工事。再就是抓弹药，现在打仗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取之于敌，现在没有弹药就不行了，有了弹药就是武器差些，也可以打。

### 四、军事训练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兵要训练，更重要的是干部要训练。现在很多干部连坦克的型号都分不清，炮的口径大小、能打多远都不知道。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要注意。

### 五、民兵工作问题。

毛主席最近指示：民兵指挥部<sup>(3)</sup>有派性的地方不要搞，不

发武器。民兵指挥部主要是城市的经验，我没有研究。要好好研究，还有时间研究。

#### 六、工作方法问题。

现在送军委的文件太多、太零碎。很多文件不能都送到这里来，我看要砍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总参要研究个意见出来，哪些事情总参可以处理，哪些要报军委，要搞个章程办法出来，报军委审批后，就按那个办。工作要按级负责，分工负责，敢于负责。国务院过去有个办法是，一段时间内做了哪些事情，综合一下，列个单子，处理了哪些事情，有哪些同志圈过，送有关负责同志一看就知道了。总参的重要事情，可以集体办公，集体处理。目前总参党委的事，主要是由八位常委来处理。军委工作是叶副主席<sup>[4]</sup>主持，属军委管的事情直接报告叶副主席。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同志汇报时的谈话要点。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在毛泽东建议下，决定调动八个大军区司令员的工作。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3] 民兵指挥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出现的自成系统的武装体制。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全国一些地区也相继成立民兵指挥部，造成民兵工作领导体制的混乱。

[4] 叶副主席。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 军队要安定团结<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

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下命令不听、不执行，不行。问题的实质是看我们执行方针是不是坚定。有个办法研究一下，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先搞个试点嘛！凡是有军籍的人，团长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军区司令员，陷到派性里去的，不管有多少，统统调出来。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搞武斗的，第一不叫“人民”，第二不叫“解放”，只叫“军”。凡是处理地方问题，军队陷入派性，要先处理军队，军队干部一律调走。军队就是要处理这批人。从现在起要三令五申，宣布再宣布。至于军队责任大还是地方责任大，不计较这个，不管有理无理，总而言之，不允许搞派性，搞武斗。毛主席已经有指示了，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枪也不要发。

现在就是两个问题。第一是超编多，恐怕在部队缩减之后，除现在超编四十多万人之外，还会更多一些。可能会有一百万人的处理问题。这要中央、国务院、军委统一处理，绝大多数放到地方企业。第二是每年要正常处理五万人。这要考虑一下，不要再堆几年又是好多人。要减少一百五十万人，一百万兵，五十万干部。这样可以减少开支十个亿，这十个亿用来搞装备，军费开支并不要减。

我提个问题，师以下的干部应适当规定一个年龄限制。当然这两年不可能，等这一批干部处理完了以后再作规定。连职干部大致限制在二十几岁，营职干部稍微大两岁，团职干部可以三十多岁，总不能到四十多岁吧？要研究一下。过去打仗不发生这个问题，现在不同了。哪一级干部到多大年龄，大体上要有个规定。干部到了规定年龄，提不上去，他就会考虑走的问题。因为有制度规定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到时候不费多少口舌。

军队也有安定团结问题。前几天，我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过，不管几项工作任务，今年每个党委第一条是要安定，要团结<sup>[2]</sup>。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如果说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就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问题，但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还要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军队的思想问题一大堆，例如派性同党性不晓得哪个强哪个弱。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批林批孔<sup>[3]</sup>当然是重要的内容，总还有别的吧。如连队工作、党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要开个政治工作会议。政治工作问题也可以向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但是需要有个专门的会议。这两个会议，同志们都要准备一下，研究一下，有意见提出来。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指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二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插话时说，武汉军区对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搞了七条，第一条应该是安定团结，毛主席去年二月就讲了这个话，要安定，要团结，很重要。安定包括落实政策。

[3]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随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

## 军队要整顿<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一九五九年林彪<sup>[2]</sup>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总参不参，这个状况要改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现在是问题成堆。我们总参谋部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好好地清理一下，使我们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

今天就是同大家见个面。军队究竟怎么搞法，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议。但是我想，刚才说的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

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2] 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压缩军队定额，抓好装备质量<sup>〔1〕</sup>

（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

总参工作，第一抓压缩定额问题，第二抓装备问题，第三抓作战问题。作战问题稍放后一点，打起仗来时间还来得及。

压缩定额问题。总的精神还是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办法首先是搞出个编制来。有了编制，就有了依据，就好统一思想。只一个一个地扯具体问题扯不清，也解决不了。这个编制，不是讲具体编制，而是指哪个单位大体上搞几个机构，编多少人，要有个标准，多了不行，少了可以。

步兵师可按大师、中师、小师编。大师是满员师。中师、小师，主要是减步兵，技术兵不要减，一定要保留技术骨干。如坦克手，不是一下子就能培养出来的。

守备部队，也要分别情况，有的地区可以减，有的地区不能减，如“三北”<sup>〔2〕</sup>地区。新疆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些，但不能太多，研究编制时一起考虑。边防上要有一点机动部队，防止敌人抓一把。

铁道兵、工程兵可以多减一点。铁道兵主要是负责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铁路修建任务，内地的铁路一律交给铁道部去修。铁道部的施工队伍有四十万人，一年可修两千公里。地下铁道交地方搞，交铁道部或北京市，速度一定会加快。铁道兵要减，但技术骨干要留下，这样打起仗来要扩大就好办了。

工程兵的任务主要是搞一些特殊的重要工程，一般工程由部队搞。工程兵也可以多减。

大军区、省军区的编制，不能一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区别。有的部队多，任务重，可多编一些，有的可以少编一些。大体上可以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北京、沈阳，边防任务重，部队多，自然要多编一些；济南、南京、福州、广州、兰州、新疆可作为一种类型；成都、昆明、武汉又可作为一种类型。省军区，有的所在省人多，如山东、四川；有的人多而无边防任务，如河南；有的地广人稀但有边防任务，如新疆、西藏，所以编制要有区别。

海军、空军的体制现在不宜变。考虑海军、空军体制时，要以是否有利于海军、空军建设为原则，怎么有利怎么干。双重领导以海军、空军为主，干部的配备培养，政治思想工作，技术装备，部队建设，还是由海军、空军直接领导有利，打起仗来可归军区指挥。

后勤机构重叠，人太多。有些机构，如办事处、分部、兵站可以减掉。不要各搞一套，重叠的要去掉。将来打起仗来，还是过去那样，以地区为单位，能独立作战。

总参的体制问题。通信兵部是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过去历来都是这样。装备部要划到总参来。军务动员部可以分开。

搞编制时要考虑到干部多的情况，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有些副职在编制上可考虑多配几个，如副团长本来一个够了，可考虑编三四个。压缩到四百五十万人后，第二步还要压缩。把我们机关搞得精干些，打起仗来就比较好了。

整编任务从一九七五年算起，一九七七年完成，实际是三个年头、两个征兵年。

装备问题。驻厂军代表是否取消，可缓一步，现在不要

忙，人数也不多。军代表和工厂在产品质量上的矛盾，已解决多少年了，现在还没解决好。军工产品就是要搞好质量，质量第一，要过得硬，打仗嘛！至于将来某一个工厂，某一个产品质量真正过关了，可不搞常驻军代表，采取流动检验的办法。总参要很好地抓一下装备问题，要在最近几年把装备搞上去，将来打起仗来就有办法了。我参加军委工作以来，主要抓两件事：一个是在北面几个口子做点工事，不让敌人长驱直入；一个是抓弹药。打起仗来，靠从敌人手中获得弹药是不行的，口径也不一样，我们不能用。

干部问题。现在干部超编很多。连排干部转业还是以到农村为主，都到工厂办不到。要考虑干部储备、装备储备、兵员储备三结合的问题。仓库的分布和建设也要从三结合来考虑。平时储备要和战时动员计划结合起来。这样一旦有事，扩建部队就方便得多。这个部队调动了，下一个部队就可以接替上来。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同志汇报时的谈话。

[2] “三北”，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 要在明确编制的基础上精简<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

小师的炮兵团要保留，可以编小一点。现在编坦克师的办法要研究。将来坦克多了，每个师要考虑编个坦克团。不然，平时结合不起来，打起仗来临时配属不熟练。

关于飞机质量问题，要讲清楚，不合格的飞机，军队一定不能接收。现在援外的东西质量也有问题，影响很大。这件事要专门开个会，同几个机械部讲清楚，军用品必须保证质量，不合格是最大的浪费。教练机不够是一个大的问题，飞行时间又太短，要先造教练机。掉飞机有许多原因，指挥上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样，飞机的质量一定要保证。

一定要搞个编制表。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或武汉军区，都可以搞一个编制表。总部自己也搞一个。海军、空军也可以搞一个。然后再统一研究。有了编制，定额才能压下来，秘书、公务员才能减下来。住房的平方米数也要规定下来。要编制管定额，不是定额管编制，要在明确编制的基础上才能精简。现在大师已经有了一个编制，中小师要编多少，技术兵保留多少，先要有个编制。干部也是一样，现在一个班子好几桌，一桌是六个人还是八个人，你不先定下这个怎么行？所以我总是强调先要搞编制。没有编制就没有编内编外。编制就是制度，有理无理，第一条就是看你合不合编制。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讨论军队编制问题时的讲话。

## 美苏讲裁军越厉害，越是 掩盖更大的扩军<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

对两个超级大国裁军的问题，我们曾多次阐明过立场。我们认为，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带来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争的危险。所谓裁军，美苏两家叫得最凶，事实上掩盖着新的世界大战争的危险，掩盖着他们拼命的扩军。人们都注意到，美苏总是拼命宣传所谓裁军，比如去年十一月，他们把海参崴的核武器协定<sup>〔2〕</sup>也叫裁军。实际上，福特<sup>〔3〕</sup>和勃列日涅夫<sup>〔4〕</sup>达成的这个协定本身就是一个扩军协定，而不是什么裁军协定。他们特别避开核武器的质量问题，他们说的核武器弹头的数量，也是向上涨的，即使增加的不多，不控制质量也还是等于扩军。回顾从一九六三年以来，他们一共搞了三次核武器协定。一九六三、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各搞一次。每一次达成协议之后，两边赛跑跑得更快。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每一次协定后，苏联跑的速度总是比美国快。如果说一九六三年苏联和美国的差距相当大的话，那末，现在美苏两家核武器的水平已经接近了。

在制止美苏两家扩军方面，中国无能为力。我们只是把真相说出来就是了。美苏扩军不仅是核武器的扩充，人们常常忽略的常规武器也在扩充。美国和苏联自称的所谓战略武器，实际上只是指核武器。其实，常规武器也是战略武器。在常规武

器方面，也是苏联比美国跑得快，包括飞机、坦克和常规导弹。美国有一批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危险性，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也在急起直追。这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总的看法是没有什么裁军。裁军讲得越厉害，就越是掩盖着更大的扩军。

现在，他们两家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包括拉美、欧洲、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中东、印度洋、太平洋，都在争夺。他们也叫什么“和平”，他们两家拥有那么多核武器，那么多常规武器，还要拼命地发展。这么多武器拿在手里干什么？东西多了，手要发痒的。所以，我们不相信什么“持久和平”或“一代人的和平”。我们双手赞成和平，但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手上的东西多了，双方都怕打。但只要在某一点上触犯了两国的利害关系，战争就可能会爆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美国和苏联裁军有道理，要某些西方大国裁军有道理，但要一些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裁军有什么道理？如果美国和苏联要裁军，那很容易，销毁一些核武器、常规武器就是裁军。不销毁算什么裁军？他们哪一家愿意销毁一些东西？人们总是希望裁军，美苏也拼命讲裁军，其实不过是一句空话。全世界人民倒是应该提高警惕，注意他们假裁军的后果所带来的世界大战争的危险。不做这样的准备要吃亏。

今天，要真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别人都没有这个本领，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这个本领，没有第三家。目前，我们也搞点核武器。法国也搞一点，对法国搞点核武器，我们是理解的。英国也搞一点，不多。我们搞一点，理由是，你有，我也有一点。只有这么一个作用。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都销毁吧！我们告诉美国人，我们不跟你们赛跑，我们还是搞小米

加步枪。除非中国人练出这样一个本领，就是每天不吃饭，这样才能和他们赛跑。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发展一点核武器，是为了达到消灭核武器这个目标。法国有一点核武器，也是给苏联和美国看的。既然战争的危险来自美苏两家，那末，跟着哪一家走都是危险的。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圭亚那总理伯纳姆时谈话的一部分。

[2]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晤时商定，到一九八五年美苏各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的总额限定为两千四百个，其中运载分导多弹头的导弹不得超过一千三百二十枚。这个限定远远超过美苏当时拥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而且没有限制质量。双方还签署发表《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重申愿意签订期限到一九八五年底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定。

[3] 福特，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4]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 关于兵种编制问题<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将来野战军恐怕都要编个坦克团，再就是编坦克师，这样有利于作战机动。机械化军是否编三个师，要考虑。至于军区是否组建特种兵领导机构的问题，下一步考虑野战军编制时，再通盘研究。特种兵究竟如何编法，步兵、坦克怎么结合，要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定下来。

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将来打起仗来，军委的指挥方式，只能是战略的指导。组织部队，战役的具体指导还是要靠各战区。各战区要独立作战，机动就靠这一点，才能抓住战机。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兵种领导机关编制时的插话。

# 代表人民利益是我们 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据我们过去同蒋介石斗争的经验，谁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谁能坚持团结，谁能坚持进步，人民就选择谁。人民是从这三个方面去选择的。一时的军事优势决定不了胜败问题。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最先进的装备，用最好的武器装备他。他控制的地区有四亿人口。我们那时装备不好，只有一百二十万军队，根据地只有一亿人口。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自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sup>〔2〕</sup>。我们坚持团结的方针，而蒋介石破坏这个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这样他就破坏了团结，就输了理。他是美国的走狗，而我们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坚持民族解放；他极端反动，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而我们站在人民利益一边。所以，人民最终选择了我们。他的军队虽然有最好的装备，人数差不多是我们的四倍，但因为政治上是这样，他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他的兵不替他打仗，因为大部分都是抓来的。他的兵被我们解放过来，经过教育后就是很好的战士。后来，我们有的连队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如果愿意回家，我们发给足够路费，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家，愿跟我们一块打蒋介石。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彻底消灭了蒋家王朝。我们真

正站在民族解放一边，最坚决地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人民就选择了我们。这是政治上的因素决定了我们的胜利。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双十协定》，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抵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但不久国民党即撕毁两党达成的协议，向解放区进攻。

# 国防工业和军队装备 工作的几点意见<sup>〔1〕</sup>

（一九七五年四月）

—

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抓。有的干部要调动，有的就是要撤掉。国防工办要抓几个点，三机部五机部也要抓点，通过抓点推动全面工作。要派得力的干部下去。派那些和稀泥、讲话不明朗、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去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工厂是坏人当政，把工人都带坏了。他们以派性作掩护，贪污、盗窃国家财产，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不管什么“派”都是错误的，一切“派”都要坚决排除。搞派性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必须排除派性。

装备维修存在的问题太明显了。重生产不重维修，建国以来就存在这个问题。不光军工生产，其他方面也有这种情况。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了，今天这样决定下来：第一，要重维修，宁可少生产一点，也要把维修的问题解决好；第二，要搞一个维修保养的计划，海军、空军、装甲兵都要列个单子，统一考虑，统一解决，包括建维修厂，修船坞、码头等一块解决，不要零星解决；第三，要按一定的比例生产零备件。这个比例占多少，要搞出一个规定，没有零件配套就不能算完成生

产计划。

有些重要工厂的位置调整要有个计划，过去位置不适当的，要慢慢地调整移动。

装备的动员计划，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搞多少，二是搞多少零备件。另外，还有投资的问题。过去我讲过，新的装备还没有搞好，旧的就不能停产。新产品试验还没有成功，旧的怎么能停产呢？要有自己的创造，但别人有好的东西也可以用，现在美国飞机发动机还不是用英国的？所谓搞自己的，实际上也包括别人的东西在里边。

武器型号在编制里就要确定下来，不然就乱了。今后要注意，武器型号不要搞得太多，型号多了，不但影响生产，更大的问题是影响作战。

战略储备这个问题还要研究。储备究竟搞多少，要计算一下，搞多了也是个问题。装备的抓总问题，今后由总参负责。科研究竟由谁抓，要研究一下。科研队伍要集中，研究院归机械部，不能再分了。

## 二

机械化部队要搞一些装甲车辆，一下子解决不了，要慢慢增加。海军要搞到什么规模？这个问题要考虑。飞机的生产，要根据生产能力和原材料的水平，在军用飞机达到一定数量后，就要转入生产民用飞机。舰艇、坦克的生产也有这个问题，当生产到一定数量后，就要转入生产日用品和工农业机械产品。

科研队伍要集中，还要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机构，批准科研试制。现在问题是由谁来抓总。军

事工业的科研也必须搞规划，如炮的生产，要求有多远的射程，有多重，有多大的威力等，都要提出要求，搞个规划，然后再委托有关部门去研制，这样才能集中力量，有目标地去研制，而不是海阔天空地去搞。飞机、舰艇的研制生产也是一样，也要搞规划，达到什么目标，要有明确的要求。要定型后才能生产，不然搞出来又不能用。是不是由国防工办管这个事，搞一两个副主任来抓，下面再搞个机构专管，或者总参下面搞个委员会来管。这个问题还要研究。

飞机搞多了就有个机场的问题，舰艇搞多了也有个码头问题。要通盘计算一下。装备搞多了，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民兵武器搞得那样笨重，就失去了民兵的作用。

### 三

调整领导班子不能再等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能就等那么少数几个人。决不能手软，手软了不行。不是有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嘛！首先是各部部长不要当软班子的班长。

现在的问题是，陆军、海军、空军都搞大了。而经费一年只有那么多。不然，资金都搞了国防建设。大家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不能是虚假的，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 四

现在飞机的性能差，除非驾驶员技术高，还可以飞得好一些。可不可以设想，不在数量上追求。

战术导弹现在没有一个机构抓，总要有个单位管嘛。有的主张设个小部或局，我看归国防科委管比较适当，便于统一计划，他们搞并不要增加多少人。这个问题不要拖了，军委要早点定下来。导弹的射程有远有近，但有共同性，搞一个机构统一管起来，可以统一规划，统一指导，互相促进。不管哪个单位搞，要有个机构，对方案、经费、材料、定型这些问题实行统一管理，不能各搞各的。

正常情况下的装备修理，以使用部门为主。现在飞机、舰艇大量失修，不修就要报废，光靠使用部门解决不了。我们的方针是，宁肯少生产些，也要搞修理。现在生产部门也可以搞些修理厂，以后再将修理厂改为生产厂。现在那么多东西停放在那里，战斗力是虚假的。损坏的舰艇在水里泡着，不修理怎么行！再一个办法是扩大海军的修理厂，但那样要搞营建，投资太多。主要是要研究些新型号，搞得更现代化些，搞点大中型的，小型的临时生产也来得及，可以少搞点。这样可以腾出点力量搞民用船。

## 五

我讲几点：

第一，要使现有工厂都能生产。目前多数厂能够生产，问题是那些关键厂，有的不生产，怎么得了！各个机械部都有这么一些老大难的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改变现状。可以用中央九号文件<sup>[2]</sup>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因为它见效嘛。工厂和铁路也有些不同，因为铁路统一归铁道部，而工厂归各省市。但各部不要放弃职责，对关键的厂要主动抓起来。你去抓，省委不会反对。听任他们这样闹下去，像没有什么办法似

的怎么行！不解决老大难问题，现有的生产力就不能发挥。有些厂不仅涉及一种武器，而是涉及很多种武器。所以，各部要把那些老大难的、最难解决的厂抓起来，不要推，并要取得省委的帮助。如果省委无能为力，以各部为主去抓，抓好了还是省委去管，体制并未变嘛！

第二，装备体制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否则的话，就是个“杂货摊子”，计划没有办法订，仗没有办法打，弹药没有办法补充，指挥也不方便。这个问题恐怕总参抓总比较好，要定一下。这不排除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各个地方要搞什么新武器，要报告，要经过批准，再给经费、材料去试制。试制出来不一定适用，不适用没关系，哪有一个东西一下就试验成功的？为使试验有效，合乎装备的要求，必须集中统一。没有经过总参、军委审批，不能随便投入生产。

第三，制造和修理的关系必须通盘解决。按常规的办法，产品和零备件要有适当比例。应当宁肯减少飞机生产数，也要把零备件的生产列入计划。现在的状况，飞机、舰船大量失修，一面制造一面又有损坏，超出了常规的百分比，零备件不够用。舰船的维修问题很大，码头不够用，淡水冲洗也解决不了，很简单的马达发电也不能解决，损坏的舰船天天在海里泡着太可惜。宁肯少生产一点舰船，也要解决维修这个问题。造一条船就要真正能顶一条船用。现在对待失修的办法，一个是让它报废，一个是想办法修理。是使用部门修还是制造部门修？现在两家都要修，不修不行。这个问题，海军、空军和各个机械部都要研究一下。总之，要把现有失修的装备修理好，不然损失太大。

第四，要使现有的武器能打仗。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弹药，打坦克、打飞机的弹药太少，怎么能打仗？五机部已经抓了一

下，有点成绩，但还差得很远。我们的武器比抗美援朝时好多了，但是要解决枪弹、炮弹，才能打仗。

此外，从部队编制上考虑，哪些装备太杂不要了，哪些不造了，要定下来。早定为好，不能再拖。我们要花几年时间，把“杂货摊子”问题解决一下。科研的问题也要解决一下，部院合并，有的人想不通，军兵种还要留人，我看就不要留了吧！类似这样的事要早点定下来，不要拖了。军队不是讲究痛快吗？一件事拖好几年不解决，这怎么行，怎么能打仗。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军队装备问题汇报时讲话、插话的主要部分。本文第一至第四部分是四月二日、三日、九日、十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第五部分是十四日听取汇报后的讲话。

〔2〕中央九号文件，指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 要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和 科研生产制度<sup>[1]</sup>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sup>[2]</sup>办。不能让他们损害国家利益，不能容忍他们这样闹下去！现在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军委调。对那些还搞派性的人，就是照这个章程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至于属于工作方面的大字报，要认真对待，正确的就应该接受，有错误就应该改正。

你们的计划很好，但到时候一定要拿出东西来。第一是要注意抓关键的科研机构、生产单位，把人员搞精干，要真正得力，其他人员编外处理。不要搞得臃肿不堪，互相妨碍。建新点一定要搞好，打派仗的不要去。有了派性，人心不齐，什么也搞不成。定型委员会机构不能太大，人不要太多，成百人不行的，要搞精干一点。一开定型会，一百多人参加，定不了型。这次搞的定型工作条例和研制、生产规划都可以同意，还要报政治局批准。问题是国防科委、七机部、二机部要保证实现，不要到那个时候，东来一个报废，西来一个失败。过去试验都是成功的嘛。打一发弹多少钱呐！钱是小事，耽误时间是大事。即使一个弹损失一亿元，我们国家虽穷，还可以拿得

起，但时间失去了，是回不来的，再不能损失了。

还有一条就是要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政治思想整顿好了，安定团结搞好了，一定要建立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特别是尖端的东西。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一个小零件，就可以毁全局。建立规章制度也要搞群众运动，做到家喻户晓。关键性的生产机构，领导干部、人员要配好。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听取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第七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2〕中央九号文件，指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 军队整顿的任务<sup>[1]</sup>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 一 我们军队的状况

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军队不管是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不讲抗美援朝<sup>[2]</sup>这些大仗，就讲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sup>[3]</sup>这些不大的仗，在战斗中，不管派一个团、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也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有的同志告诉我，现在军队团以下情况除个别的以外都不错。这一点我们是高兴的。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总的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

一是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二是有点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经过整风，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整风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拧成一股劲，力量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再没有提出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那末，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sup>[4]</sup>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以后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了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容忍的。现在，军队里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其实，那些常常吹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讲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闹派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反过来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的派性问题也不能解决。

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我们说，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

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军队组织纪律性差，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个人服从组织呀，都不管了。过去军队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命令一下，二话不说就行动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违抗命令。组织纪律性差同派性有关。他们考虑的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们那一派的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现在，要调动一个人可不容易。许多人都喜欢留在大城市，特别是喜欢在北京，要调到别的地方去，很困难，说什么身体不好，调到外地心脏病肯定要复发，可是在北京，心脏病就好了。总之，理由多得很。

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比如，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又如，要军队同志帮助地方消除派性，使群众团结起来，可是有些同志就是不执行这个方针。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又是政治纪律问题。

最近，中央连续发了几个文件，都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地方有，军队也有。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这段时间，地方上对这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比较快，军队慢了一点。

三是有点骄。骄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战争年代军队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就容易骄。这种情况，经过多年纠正，比较好了。但是应当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

而是骄横。有的人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现在，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的，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sup>[5]</sup>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四是有点奢。上面讲到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策的。有些人从地方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有的拿了东西连个手续都没有。军队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sup>[6]</sup>，办了不少农场、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的精神。现在有的农场、企业赚了钱，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还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这种情况要整顿。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就应该还嘛。有的房屋、土地，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也有是霸占的。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多讲了。

五是有点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

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写出来照着稿子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的，那不是八股？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个人的思想原因之外，组织上支持帮助不够也是一个原因。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助。中央有责任帮助各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

总之，军队总的形势是好的。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

## 二 军队要整顿

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总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吧！规定配一个秘书，就不要用多了嘛。秘书少一点有好处，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一点

脑子，对自己好处多啊！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了解。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 三 军委的工作

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我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国家正在考虑下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现在一个战士要背几十公斤，怎么打仗呀？到时候，非战斗减员不知有多少呢！这不是小事，也是装备问题，也要研究、定型。总后勤部要订出规划，要有一些人专门管这个事情。

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我们作战，有个战场问题，还有遇到什么情况怎么打法的问题，这些都要设想到。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

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还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现在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比如，连队的伙食普遍不好，花钱很多，吃得很差，这就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还多得很。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

很多同志提出，希望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我看这个意见很好，是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要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在配备政治工作干部时要注意质量，政治干部要能起模范作用。现在军队里的干部问题很值得注意。怎样按照选拔干部的条件去做，这很重要。加强政治机关，特别要注意加强管干部的部门。政治机关的干部，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我们的传统历来是政治机关管干部，首长总要经过政治机关去考核、审查干部，这才符合组织原则。要把这个好的传统继承起来。要特别注意加强连队政治工作。连队干部，尤其是指导员要会做工作。可以考虑连队指导员的年龄稍微大一点，任职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只干两三年就换了，经验就积累不起来，就不会做思想工作。另外，军队内部的团结问题，军队和地方的团结问题，军民关系问题，都要研究。

## 四 整编中的干部问题

现在整编中的干部问题是两个：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的安置问题。有几十万干部转到地方，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这也是我们军队自己的事情，所以军队对地方要支持，要帮忙。现在地方上干部也多，安排不容易，有些同志遇到问题可能回军队告状。这个问题大家都要注意，军队要采取支持地方的态度。在军队内部的问题，就是谁留谁去，谁在职谁不在职。支左回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靠边站的干部，现在都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应该通盘考虑。留在军队的师以上干部，谁在职，谁不在职，谁当顾问，解决好这些问题不容易，工作量很大，要妥善处理。刚才我讲的要连带解决的那几个字，跟安排干部问题有关，也要很好考虑。还有一个干部调整、交流问题。毛泽东同志讲了，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sup>[7]</sup>外，省军区和有些部门的干部也要交流一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有的在地方卷入了派性，妨碍地方的工作，总要调换一下嘛。如果有了山头，一定要去掉，要把山头平一平，把干部交流一下，不要挤到一堆。有些人适当调动一下地方有好处，主要是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总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对干部要教育，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我们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否则有些工作没有人去做，都要中央派人，或省、市、自治区派人，那怎么行啊？军队也一样。配备

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所以现在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讲一讲顾问问题。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谁去谁留的问题，不可能统统那么公道。毛泽东同志说，当了中央委员，不一定就比别人强，没有当中央委员也不一定就比有的中央委员差。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当顾问的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的安排。对顾问，组织上要关怀，这个关怀有物质待遇问题，但是特别要注意对他们政治思想方面的关怀。要使他们能够看到文件，听到报告，同级党委里面有些事要让他们知道。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常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这要讲清楚，因为工作不需要，并不是降格了。当顾问的同志也要自觉。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不要人家请客，不要办酒席。下去到处跑，到处请客，而且都是老上级，不请客就说不尊重，就不高兴，那还得了！下去检查工作要有计划，不然下面受不了。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

## 五 高级干部的责任

搞好军队的责任首先在我们到会的同志，扩大一点，到军以上的主要成员。我们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 我们党的一套优

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如果我们这些人搞得不好，就会把军队带得很不好，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会发展。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过去几十年，军队总的是很好的，我们是出了力的，功劳是有份的。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看，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

以上几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8〕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3〕 珍宝岛自卫还击战，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击退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战斗。西沙群岛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渔民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西贡当局军队进行的自卫还击战。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印度入侵军进行的自卫还击战。

〔4〕 支左，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

〔5〕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

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6] 五七指示，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7]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在毛泽东建议下，决定调动八个大军区司令员的工作。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8] 这是毛泽东给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题词，见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sup>[1]</sup>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

几个月来，中央连续发了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生产问题等几个文件，方针政策都明确了。要我讲几句，还是些老话。

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多数工厂企业已经解决了，还有少数没有解决。“老大难”单位，无非是这么个问题。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本厂可以找，本厂有困

难，外厂也可以找，本地区也可以找，哪里会找不到人！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

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现在的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有多少国防工厂完成产值多少，产品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你们切不可满足于这些数目字，这个话以后少讲为好。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国防工办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飞行事故多，当然这里面有部队训练不好、飞行员素质差、地面指挥水平低等问题，但是也要研究飞机质量方面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由于那个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头的零部件出了问题。在检查的时候，就是那个百分之零点五没有检查到。我们有几次科学试验没有成功，经过检查，并不是技术没有过关，而是那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的零部件质量没有过关，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达到要求。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同时，也要请管国防工业的同志把科研工作抓紧，因为现在确实有好多军工产品，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sup>[2]</sup>，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sup>[3]</sup>。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

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有些干部不是喜欢养鸡、养兔、养鸭吗？如果把自己关心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转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我想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还有在山区的三线<sup>[4]</sup>工厂，那里的商业工作也要改进。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调点粮食给一些城市的郊区养点猪，比如调五亿斤粮食，养五百万头猪。这些粮食不是全国到处分配，而是搞几个点，专粮专用。甚至还可以考虑用现代化的办法搞些养鸡场。这个问题要研究。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

[2] 三结合，这里指在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工作中实行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

[3]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诬蔑为“臭老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以此批评“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诬蔑，说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需要知

识分子的。

[4] 三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

## 关于话剧《万水千山》的谈话<sup>[1]</sup>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我看过《万水千山》老本子的演出，毛主席的两点指示<sup>[2]</sup>我也知道。修改后我没看过，昨天向你们要来剧本，读了你们提出问题的那些部分，没有来得及全看。找了些看过戏的同志谈了一下，印象是演也可以，不够满足。本来一个戏写整个长征是很困难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不容易写好。现在的戏政治性语言很多。我看结构不要变了，十幕就十幕，不动了。有些政治上的问题，还要好好斟酌一下。

一、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写得不够。张国焘<sup>[3]</sup>搞分裂以后，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当然，红四方面军内部对张国焘不满，有其内部因素。这方面还要加一点对话，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遵义会议<sup>[4]</sup>之后，红二、六军团是拥护毛主席北上路线的，他们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长征；二是写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二方面军推动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也是拥护毛主席的北上路线的，先到了陕北。在剧中写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中，红一方面军教导员和红四方面军营长的对话里，要讲到红二方面军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北上路线的。现在只在尾巴上提到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了，很不够。这里要有两个加重：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的作用要加重，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走毛主席北上路线要加重。第八幕中还应讲到陕北红军，把整个红军各方

面都照顾到。不是要加戏，结构不动了，在适当的地方加点对话可以解决。

二、要把长征中的路线斗争写明确。事实是在江西时，毛主席提出渡赣江，出湖南，调动敌人，然后再回江西，他们不听。打湘江时，毛主席没有权了，那时一天走四十里，坛坛罐罐一路丢，八万多人的队伍，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多。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提出北上路线。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斗争，主要是北上和南下之争。一个是北上，前进的路线；一个是南下，退却逃跑的路线。一定要写清楚为什么北上好。这里要写：（1）要打日本；（2）领导全国抗日运动；（3）接近抗日前线，有陕北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而张国焘的南下，是退却逃跑，逃避党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任务。南下是到人口稀少的藏族地区，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张国焘是分裂主义、退却逃跑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样写就把两条路线搞明确了，现在的稿子写得不明确。戏的中心是描写两条路线斗争，要写红四方面军营长也赞成北上，要用语言表达清楚。

三、要写陕北根据地是落脚点和出发点，甚至可以提到刘志丹<sup>[5]</sup>。要把中央红军到陕北，挽救了陕北根据地的话勾掉。陕北的问题，是红二十五军到后，执行王明路线<sup>[6]</sup>的那些人搞的。这个问题无损大局，正面讲为好。要写红二十五军执行毛主席的北上路线，先到达陕北，打了几个胜仗，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加强了陕北红军的力量。陕北根据地的作用，写落脚点、出发点就够了，了不起啊！长征就是要找个家住下来，这是毛主席提出北上抗日路线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就是没有陕北根据地也要北上，因为红军要有群众，草地一无人，二无粮，怎么建立根据地？陕北

作为一个游击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全国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新的革命的出发点就不得了。有这个落脚点和没有这个落脚点可大不相同。红军一出六盘山，看到戴赤卫队袖标的陕北游击队，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长征一年没有个家，这回可算到家了。

四、直罗镇战役<sup>[7]</sup>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争取东北军，而在于打开了通向陕北根据地的通道，在战斗中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所以毛主席把这次战役的胜利叫做“奠基礼”。当时红军队伍人数很少，一共只有一万多人，但这一仗不打胜不行了，所以毛主席亲自到前线指挥，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就是敌军长董英斌<sup>[8]</sup>跑掉了。战斗的结果，使东北军认识到，同红军对销，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西北打内战，就是为了要它同红军对销，最后蒋介石进来。对西北军也是如此。剧中写了东北军一个炮兵营投降，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和历史事实不符。要写，也不要讲投降，要讲起义。可以改为东北军不满蒋介石，不愿打内战。写我们派个把人去做工作也可以，写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绪和厌恶内战的情绪，通过直罗镇一战的胜利，促使了统一战线的形成。那时东北军确实不愿意打了。在语言中，要表达出我们同东北军有联合抗日的基础，可以争取他们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五、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地点较难处理。写在延安会师也可以，真实的会师地点是在会宁<sup>[9]</sup>。山城堡战役<sup>[10]</sup>三个方面军都参加了。把延安描写为新的革命时期的起点，全国抗日运动的领导中心是可以的。但为了符合历史事实，可以说，三个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以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延安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全党、全军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循着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戏中三个方面军会师时，对会师的政治意义突出得不够。要把毛主席总结长征时说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意义表现出来；要把毛主席说的红军数量减少了，但不是弱了，而是更强的意义表现出来；要展示出全党、全军循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迎接革命新高潮的伟大前景。会师时，不要检讨了，要表现出胜利的喜悦，把胜利的气氛加浓一点，表现出大家都高兴的心情。

六、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sup>[11]</sup>。当时红军要同数倍于我之敌作战，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但蒋介石也得听毛主席的指挥。毛主席先是把一军团摆到远处，吸引敌人，把敌人主力甩得远远的，然后在遵义附近消灭了王家烈<sup>[12]</sup>的几个团和蒋介石嫡系吴奇伟<sup>[13]</sup>两个团，最后，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经过五个月的斗争，最后只用七天时间，就渡过了金沙江，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真是了不起。渡金沙江时，毛主席一直在岸边指挥，直到最后一军团渡过江才走。七天后，蒋介石的部队才赶到，只拣到红军的一只破草鞋。这些在一幕戏中很难写好，但也可以考虑在过彝族区一场中，通过对话回叙一下四渡赤水，畅谈胜利的喜悦。“只拣到一只草鞋”这样的语言可以写上。林彪<sup>[14]</sup>就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下台的。他胡说这是“脚底板擦油，把部队拖垮了”。毛主席在渡金沙江后的会理会议<sup>[15]</sup>上说，毛孩子，懂得什么，就是批评林彪的。

遵义会议后，一直在找个立足点。开始想在川黔边建立根

根据地，后来想在川南、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以后才决定继续北上到川陕甘，但戏中可以讲北上抗日。北上，这是个总的战略方向。

七、戏中“一〇一”指谁？这个问题要回答。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主要是毛主席、周总理和王稼祥<sup>[16]</sup>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遵义会议前，主要是王明、博古<sup>[17]</sup>等，搞“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总司令名义上是朱老总<sup>[18]</sup>，实际上指挥全军的是外国人李德<sup>[19]</sup>。遵义会议中心是推翻李德、博古他们两个。所以叫“一〇一”不行。如果“一〇一”是指林彪，也不行。他那时只是个军团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王明路线领导者或执行王明路线的人。上面来人传达命令，可以说是上级命令。李教员可揭露说，这是王明路线领导者的命令。这样明确一些好，免得观众乱猜。

总之，全剧的中心是要突出毛主席的思想。另外，把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加强一些。讲清楚长征后红军缩小了，但更强了，讲清楚长征的伟大意义，树立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迎接革命的新高潮。这样才能反映出在艰苦奋斗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话剧《万水千山》创作人员的谈话。《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一九五四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后经反复加工修改，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

[2]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观看话剧《万水千山》后提出两点修改意见：要写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一定要把《万水千山》改好。

[3] 张国焘，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

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共产党，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

〔4〕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5〕刘志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创建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一九三六年四月在红军东征作战中牺牲。

〔6〕王明路线，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7〕直罗镇战役，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地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役。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第一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尔后视情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二十一日，第一方面军利用直罗镇有利地形将沿葫芦河东进之敌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大部歼灭，随后又于二十三日在追击中将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一个团歼灭于张家湾地区。被围于直罗镇的一〇九师残敌待援无望突围，于二十四日被全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8〕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军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

司令。

〔9〕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10〕山城堡战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红军主力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地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役。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集中五个军的兵力，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四路向红军发起攻击。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一军胡宗南部孤军深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二十二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将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一个多旅歼灭于山城堡地区。此役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对促进国内和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11〕四渡赤水，指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在黔川滇交界赤水河流域进行的运动战战役。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黔北元厚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准备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中央红军调头东进，于太平渡、二郎滩地区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并一举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当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企图于遵义地区南北夹击红军时，中央红军又由茅台地区三渡赤水。国民党军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纷纷向川南调动，中央红军乘机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逼近贵阳，然后向云南疾进，于五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12〕王家烈，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

〔13〕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司令。

〔14〕林彪，当时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15〕会理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实行机动作战的经验，批评了林彪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的严重错误，决定继续北上，同第四方面军会合。

〔16〕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7〕王明，即陈绍禹，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博古，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起，掌握了

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使红军受到极大损失。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18] 朱老总，指朱德。

[19] 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着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中央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前夕，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 军队高级干部要年轻有知识<sup>〔1〕</sup>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军队要打仗，干部就得要年纪轻的，这和地方干部不一样。我过去说，年长一岁，要开明一分。军以下干部年纪太大不行。现在就要注意选拔年轻的师以上干部。用五年时间，或多一点时间，把优秀年轻干部选进学校培养，然后有的可以当半年团的干部再提上来。经过五六年时间，使军一级干部不超过五十岁，个别体格好的，不受年龄限制。师一级不超过四十五岁。怎样培养高级干部？是一下子提上来，还是把优秀年轻干部先送进学校培养，经过团、师的锻炼再提上来？经过团、师锻炼，有这么一段指挥经历，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不一样了，管理经验、政治经验就不一样了。政治干部的培养可以不同。军事指挥干部要有合成军指挥知识，比如飞机、坦克的技术性能，你不懂就很难运用，就捏不拢。还有个通信联络、协同动作的问题。一个装甲师就得用无线电通信，用汽车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四十多岁的人，没有实战经验，简单的步兵战斗还可以，但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要指挥空军、海军，对基本知识，如飞机、舰艇、各种炮、火箭的知识不了解是不行的。培养干部一个是学校，一个是演习。恐怕部队演习要多搞点，如司令部演习、沙盘作业、图上作业，得训练指挥，必须增加知识。

要给各单位打个招呼，保留的机动干部，要把其中一些优

秀的团营级干部放到学校，学习年把再提升，不要统统放到现职。营到团，团到师，再过年把到军甚至军区，这样比较稳妥一些。到学校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陆海空的知识很多，不学点知识，当团长不容易，当连长也不容易。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把训练放到战略位置上，我看是有道理的，现在没有打仗，就是靠训练。现在不是有很多顾问吗？至少可以去学校讲讲，作作报告嘛。过去一讲战例就是外国的，认为自己的少，其实我们在战略战役上的东西多得很。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尖端，是基本的。教材要组织人修改、编写。

#### 注 释

- 〔1〕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陆军军、师编制时的讲话。

## 军队现在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sup>[1]</sup>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中国人最聪明。有些中国人写的东西，我们自己不知道，外国人拿去用了。

我们国家六十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七十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四人帮”不准这样做，他们开“帽子公司”、“棍子公司”、“钢铁公司”。现在到二十世纪末只有二十三年了，你们要大胆干，绝对不会打你们的棍子。

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 ABC。从小学到高中多搞点劳动，大学要对口劳动。你们要到基地去，当然也要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你们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当然，搞电视教学现在还没有

条件。

教学时间，技术院校要三七开，三分时间用于政治，七分时间用于业务；军事院校，要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政治院校，要六分政治四分军事。要注意培养学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军队过去主要是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不要说现在的连长，就是团长也不会打仗。现在当个步兵连长就不容易，配属你炮兵、坦克，还要对付空中敌人，这就不简单了，不训练怎么行？

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是分不开的。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长沙工程学院负责人谈话的主要部分。长沙工程学院的前身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一九七〇年三月军事工程学院撤销后，学院主体部分由哈尔滨迁往长沙，更名长沙工程学院。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长沙工程学院改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十月一日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 军队要把教育训练 提高到战略地位<sup>〔1〕</sup>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四个现代化，有个国防现代化。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提出一些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

当然，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包括毛泽东同志讲的交流干部，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九七五年那一次的调整，陷进帮派活动中去的人会更多，受害的干部也会更多。那次调整，保护了一部分干部。但是那次调整的面太窄，还有些应该调整的没有调整，应该交流的没有交流。调整、交流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多次指示的，本来是应该接着做下去的，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就停下来了。

我这里讲的从何着手，是讲除了调整领导班子以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解决呢？一九七五年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在我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

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要从两个方面去做。

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军队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混乱，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纪律废弛，作风不好，在人民中威信下降。现在地方上不大欢迎军队的干部，当然不是对所有干部都不欢迎。我们解放军要有自知之明，要靠自己恢复名誉。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比如连队指导员，要在苦练中学会当好指导员。好多事故都要防患于未然。否则问题明明出来了，连长不懂得怎么搞，指导员不懂得怎么搞，甚至还会使矛盾激化。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不知道每一个兵的情况，当什么连长、指导员！一个军长，不懂得连队，怎么指挥你这个军！更不要说师、团干部了。所以军、师、团的干部，要下连队当兵，懂得自己的连队。部队训练还包括现代化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可以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对连队来说，学硬骨头六连是对的，因为硬骨头六连的作风不只是一个连队的作风，所有的连队以至各级干部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勤学苦练，有他们那种政治思想。但是，单单学习硬骨头六连还不够，还要努力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以上是谈部队的训练。部队训练当然还有很多

问题，大家可以议一下。

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缺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克服弱点、克服缺点的起点。比如我们的国家，承认自己哪些方面落后，这就有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吃了亏。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我们军队的素质在战争年代是很好的，在抗美援朝<sup>[2]</sup>时也是很好的。老实说，有那样的素质，就是用现有的武器，也可以打仗，也可以学会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条件，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

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现在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很少，要增加。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就感到政治干部缺，解放战争也感到政治干部缺。选军事指挥员比较容易，选政治干部就比较难，至少过去第二野战军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全军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现在合格的连指导员有多少？合格的营教导员有多少？合格的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有多少？有同志反映：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政治干部上当受骗甚至陷进去的，从数量上说，比其他干部多。这如果是事实，就很值得我

们警惕！部队连以上政治干部的数量同军事干部的数量几乎相等，所以，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要增加。增加的方法，也可以一个学校既训练军事干部又训练政治干部，也可以专门办政治学校。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还有，各军兵种的技术专业学校，都要恢复起来，如果不够，可以增加，有些也可以合并。

学校怎么办？我想对学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我曾经讲过，现在当个连长，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你怎么指挥？一个连是这样，更不用说营、团、师、军了。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不能像前些年办学校的办法，要讲一点有用的东西。提出这三个要求，够不够？大家研究一下。

学校有各级的：高级，中级，初级。高级的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现在的军政大学要分开。海军、空军也有高级的学校，各特种兵、技术兵种也有高级的学校；还有中级的、初级的。一个师有教导队，训练班长和排干部。大军区训练营连干部。高级学校训练团以上的干部。大体上这样区分是适当的。

办学校要达到上面讲的三个要求。我个人设想，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要达到一个目的：使干部队伍水平提高，能力加强，比较年轻化，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更要年轻些，使我们

的干部能够掌握一些现代化战争知识，并且有好的作风。通过学校推荐的干部，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基本上按这个要求，更新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

办学校需要有准备。什么准备呢？首先，是办什么学校，办在什么地方。没有校址怎么办？校址问题，既然延安窑洞都可以办，为什么我们不能搭起帐篷来办呢？或者用简陋一点的房子来办呢？其次，还要选好办学校的干部，包括教师，这个很重要。这些干部比现职干部还重要，要选最优秀的，特别是能深入实际、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干部。办学校的人要了解学员，否则他怎么推荐干部呢？怎么起到集体政治部、干部部的作用呢？办学校的干部要精选，凡是适合办学校的干部，宁肯从现有工作岗位上调出来。第三，是教材问题。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我跟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的同志谈过，请他们主持把教材编出来。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第四，要选好学员。招收什么样的人，调什么干部来学？要调好干部来学。高级学校的训练对象要稍微改动一下。现在军政大学训练的基本上是军师干部，团的干部只占百分之二十。以后团的干部的比重要增加。我建议高级学校的学员应该以团的干部为主，加上一部分优秀的营的干部，同时训练军师干部。现在有不少的团的干部打过仗，抗美援朝时当过班长，也有当过连排长的。营的干部打过仗的恐怕就少了，但营一级有优秀的干部。特种部队打过仗的营的干部还不少。

为什么提出学员要以团的干部为主呢？就是为了能使作战

部队指挥员年轻化或比较年轻化。我设想，到五年以后尽最大可能达到这一点。政治干部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但也不能太大，大三四岁可以。前年我就讲过，连指导员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多积累些经验，可以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由此类推，各级政治干部的年龄比军事干部的可稍微大一点。军事指挥员要年轻一点，但不排除个别身体好的人年龄也可以大一点。各级军事学校，教学时间的比例，可以三七开，军七政三。要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如飞机、坦克的型号、性能，怎么样对付，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怎样指挥等等。政治学校，四六开，政六军四。政治干部要学军事。教师很重要，要选好，要有一个好的教学队伍。学校领导干部可以兼课，大军区和所属部门的领导同志也都可以兼课。

对于在学校学习得好的，指挥、管理能力比较强的，现代化战争知识学得比较好的，而且思想作风又好的干部，学校可以推荐，营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团，团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师。当然，大量的干部还要回到原工作岗位，因为我们只有那么多军、那么多师。在部队搞两年，再把这一批优秀的师干部、团干部“回炉”一年，调回来再学习，主要是加深现代化战争知识，然后把好的师的干部提拔到军，好的团的干部提拔到师。这样就可以在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作战部队干部的年轻化。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员也应该这样。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 把军队整顿好建设好<sup>[1]</sup>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 三五年内整顿是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一九七五年提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是指导军队工作的纲，这没有错。现在应该肯定，“军队要整顿”至少是三五年的纲；“要准备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纲。要准备打仗，就会涉及很多的方针、政策、方法和许多具体问题，都要抓住这个纲来解决。

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sup>[2]</sup>，我认为是正确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的整顿、准备打仗的工作损失了两年时间。在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讲的一篇文章<sup>[3]</sup>，主要是叶副主席的那个报告<sup>[4]</sup>，还是要继续贯彻的。特别是关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军队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精简、减少军队员额等，都是应该贯彻的。去年根据那次会议决议，减少了十多万干部，但是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因为领导班子没有调整好，派性作怪。但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那些方针、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贯彻。

军队干部的转业，最好是把军级以上的领导班子调整好以后再进行，宁肯慢一点、稳一点。军队干部的出路，这次党的代表大会<sup>[5]</sup>上，军队组有个同志提出来，军队师以上干部由部

队养起来是“保险公司”，认为这个不妥当。一九七五年下这个决心恐怕是必要的。今后怎么办，是应该考虑的。恐怕有些年老体弱的同志，还是要军队本身负担到底；有工作条件的，有工作能力的，基本上向地方转。要通过这几年的整顿，改变干部作风，使军队的人受地方欢迎。我相信，过几年我们的工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可以容纳一批军队干部。我建议军队干部要学一点专业性的东西，学点工业的知识，可以办训练班，组织参观。参观不要光跑大庆，落后的企业也要去看一看，好的、中的、差的都去看一看，接触一下。有时也可以到工厂去劳动、蹲点。用两三年时间使干部接触工业，接触商业、财贸、文教。这样，转业到地方后就用得上，去做政治工作也好，当副职如副厂长之类也可以，当车间主任、副主任也可以，能做学校工作的做学校工作也可以。凡是要转业的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 恢复好传统

部队要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组织纪律四句话，要从苦练中培养出这些作风。部队的苦练，特别要注意干部的苦练。体弱、岁数比较大的干部，没有这个条件了。现在大军区这一级干部多数没有这个条件了。但是大军区的二级部、参谋人员，下边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应该下连去当兵。过去好多老同志，像杨得志<sup>[6]</sup>同志不是也当过兵嘛！特别是军、师、团的干部，一定要下连当兵，时间不应该太少，一年有一个月，或者两年有两个月。我们要提倡军一级干部，不单是师、团级干部，都要懂得自己的连队。过去我们当过司令的，哪个不晓得哪个连能打，哪个团好，哪个营好，甚至哪个

排好，哪个营擅长什么，哪个连擅长什么，有长于进攻的，有长于防御的，有长于夜战的。当军长的不懂得连队，怎么指挥你这个军！把哪个部队、哪个连使用在刀口上，我们都懂得的。现在我们的干部不懂了，做官当老爷，那怎么行！当一个军长，当一个军指挥员，不懂得连队，叫不合格，更不要说师、团、营了。大军区一级干部至少应该懂得团吧！

培养作风，用人很重要。恢复传统作风，我提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政治机关的老传统。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政治机关第一条任务是掌握干部。我从来没有不通过政治机关使用一个干部。我提出意见，经政治机关审查，政治机关可以否定我的意见，提出新的人选。因为你一个人的脑筋同集体了解干部，同集体管这个事情不同嘛！但最后还是党委决定。当然要按级报告，经过上级批准，有干部工作制度嘛。不管军长也好，政委也好，大军区司令也好，都应当这样。首先要把总政的职责、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要花几年时间，从总政搞起，把政治机关的作用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那种样子，特别是掌握干部的部门。大军区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好军、师政治干部的调配，选配好团、营政治干部甚至连指导员也很重要。

## 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部队至少有一部分要调动。一九七五年只对调了四个军，陷进地方派性的部队现在还有好几个。部队都是好部队，但陷进了派性，搞得地方很难办。一九七五年我讲要脱钩，这样对部队也好嘛。

部队调动，先调哪些，哪些部队要交流，要换防，都要有

个规划。毛泽东同志讲过多少次了，住久了不好，住久了就懒了。干部交流，部队调动，这应该是个制度。隔一个时期调一下，搬个家，房子不够住，要艰苦奋斗。

军队干部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干部以后调到哪里，要坚决服从，否则撤销工作。首先从老同志开始。特别是北京、省会、大城市有这个问题。关于部队办工厂的问题、财产问题、干部住房问题，总后要做个调查，形成文件，军委扩大会议通过执行。不管什么人，不执行就按军队纪律办。好多同志说希望我管军队，我管军队就要得罪人。这也是爱护军队，爱护干部。

## 要抓装备抓战略

装备要好好地抓一抓。军委要有个小组抓，包括抓战略的装备、常规的装备。其实什么叫战略的，什么叫常规的，划分并不准确，不好区分得那么清楚。空军装备是战略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我看，又是战略性的，又是常规性的。海军装备是战略性的还是常规性的呀？从总体上来说，也是战略性的。总之，不管是战略性的还是常规性的武器定型、批准、试制、生产等等，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抓。不要耽误时间。不能连步枪定型这么个问题，拖好多年都解决不了。

关于质量问题，以后要建立个制度，凡是不合格的东西，使用部门一件也不接收。研究和生产是丝毫不可分离的。七机部把一些工厂、科研机构下放了，这样不好工作。这是减慢速度的方法，应该重新考虑。我建议收回来。当然这是个人意见，要研究一下。装备就是要求质量。要在工厂设军代表，要派好的，至少有段时间要设。即使说以后不设，但三五年内要

设，因为现在工厂不能保证质量。如果三年后不需要了，三年后取消，两年后不需要了，两年后取消，一年后工厂能够保证质量了，一年后取消也可以，但现在要设。搞严一点好。不能要部队勉强接收不合格的武器。这也是一个促进生产部门的办法，否则真叫“铁饭碗”。干的活不合格，害死人。军队的武器有问题，质量不行，是要死人的，这是决定战争命运的问题，这样的事不严肃处理怎么行呢！最近飞机事故多，这与训练太少有关，也与飞机质量有关。生产部门现在都讲零备件问题、维修问题。比如一个飞机厂的生产，定下生产一架飞机，要同时定下应该生产多少备份的发动机，生产多少关键性的零件。宁肯少生产几架、几十架飞机，也必须同时把生产重要的零备件纳入计划之内。要制定规划，究竟要生产多少零备件才合理，大家可以议一议。相应的，坦克、导弹生产也如此，舰船也有这个问题。恐怕连枪都有这个问题，当然枪的问题好解决。

武器装备凡是该试验的，要定项目。试验成功的要试制，该定型的早定型，不要拖延几年不决。定了型先小批生产，搞生产线，然后成批生产。不管是哪种武器，宁肯少一点，质量第一。这是最节约的方法。

战略问题，大的战略指导原则包括战役的原则，都是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但是现在敌人不同了，我们的情况也不同于过去了。怎么样具体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学、战役学，要研究。

战略研究也要有机构，吸收一些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哪怕一年内解决也好。因为涉及训练，也涉及装备，涉及现在的工事。哪里该做工事，哪些地方多了，哪些地方少了？多了怎么办，花了几十亿元，有些要报废，怎么报废法？

有些工事不会被敌人利用的，可以不报废，有些自己用不上敌人可以利用的，就要处理。这些都要研究解决。

## 要研究兵役制度

兵役制度，可以首先从步兵服役两年还是三年这个问题研究起。好多同志反映，两年太少，都提三年。我看可以考虑步兵三年，空军四年，海军五年，看这样合适不合适。兵役制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一部分兵要长期服役。连队的司务长、炊事班长至少可以当到三四十岁，当然不一定到四十岁。连队有这么两个当家人，一百多号人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作息时间掌握得恰当一点，就大不一样了。司务长很重要，司务长年龄可以大一点，经常换不好。好多部门，比如说，空军服役的年龄就应该提高，究竟多大适当可以研究，四十多岁身体好的可以当飞行员，至于地勤人员可以专门化。还有一些特种兵、技术兵种的服役时间也可以延长。还比如守卫大使馆的，可以变成职业的，岁数大点也可以当警察，为什么作为干部就不可以看大使馆呢？时间长点，熟悉环境，熟悉任务，熟悉专业知识，肯定比两年兵熟练得多，强得多嘛。看机关的，看仓库的，看营房的警卫，可能数量更大。有些军人就可以改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待遇和军人是一样嘛，就是保持军人的资格，按干部待遇，按干部提升，但年龄有的可以四五十岁。这样是不是有四分之一的人或五分之一的人，就不要经常去换了。这个数目我没有把握。我相信这一部分人是有相当数量的。除了普通兵两年变三年，空军考虑空军，海军考虑海军，技术兵种考虑技术兵，各军兵种都要研究一下兵役制度。这个问题也可以搞一个小组专门调查研究，军委扩大会议作出

决定。总之，兵役制度要解决。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搞，怎么具体化，要大家议一议，分门别类地研究。

最后，我提议在军委之下要建立几个机构：

第一，设立一个教育训练委员会，叫小组也可以。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一、制定全军的训练规划，领导全军的训练；二、重点是办好学校，包括办什么学校，办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办，包括教员合不合格，招生的制度，教材的审定，学员的来源，它都要管。这个机构除了管这些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有一批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天天下去跑，去连队，也去当兵，了解部队的训练。到学校，也去当学员，检查工作，了解学校的训练状况。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二十个人不够，可以三十个，四十个，再多也不好。至少五年内需要这样一个机构。

第二，设立战略委员会，或者叫战略小组。名称可以研究一下。要有些老同志参加。怎样组织，什么范围，人数多少，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小组负责制订各种作战预案。这些作战预案要根据情况经常修改，但是有一个，心中有点数，比没有要好。大家都有这个要求，准备考虑个战略小组名单，军委通过。

第三，还要搞个科技小组。基本上以国防科委为基础，也算是军委直辖的。包括尖端武器、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定型，要搞得快一点。

上面讲的特别是教育训练委员会和科技小组，是要长期存在的。教育训练委员会至少五年，以后是不是还要，以后再说。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 指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军队现状，讨论了军队进行整顿的措施。

[3] 即《军队整顿的任务》，见本卷第 28 页。

[4] 指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5] 指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 杨得志，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一九五八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时曾下连当兵。

# 按照战略要求指导 国防科研和生产<sup>〔1〕</sup>

（一九七七年十月四日）

科学研究有四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是科学院。第二方面军是大专院校。大学里要加重科研的任务，有些大学还要逐步做到以科研为主。第三方面军是生产部门的研究机构，这是最大的方面军。它主要是搞生产中的科学研究，要逐步建立起来。重要的工厂应该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个方面军主要是搞应用研究，也会出理论，从实践中产生理论。第四方面军是科学普及机构。国家科委要管这四个方面军的事情。国家科委由方毅同志担任主任，张爱萍同志担任副主任。成立科技装备委员会<sup>〔2〕</sup>，要写出文件，向中央和军委提出报告。国防工办的科研、生产也要统一到这方面来。要抓规划，要出题目，搞什么型号，要求什么，决定生产什么，定型、试制、鉴定，小批生产到大批生产等任务都归这个委员会。过去，定型小组太多了，又不认真搞，连有的轻武器也长期没有定型。权力要集中到科技装备委员会，由张爱萍同志负责。军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军事方面要有一个规划，要从战略着眼，提出对装备的要求，提出科研和生产的任务，从而指导我们的科研和生产。要加强所有军事工业生产单位的管理，要建立科研队伍，并且予以监督指导。就是战士的背包也有科研课题。要统一规

划，统一领导，统一实施。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有的科研单位和工厂统统要搞一个规划。

科研和生产都要服从战略的要求。要研究提出对飞机的战略要求，提出在三五年内主要用什么飞机来装备我们的军队。轰炸机应以什么型号为主？哪一年达到什么要求？都要从战略的要求出发提出来，科研和生产要服从这个战略要求。自甘落后是不行的。生产不少落后的装备不顶用，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又如导弹，从战略上看，要求用什么样性能的导弹来装备我们的军队？要引进外国的什么东西？

海军装备的战略要求是什么？主要装备是什么？哪些要淘汰？应该还有什么内容？总之，一定要确定战略要求，没有确定的要确定，确定以后就不要动摇，按照战略要求指导科研和生产。

抓科研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配成套。现在科研、生产配套的安排，有的距离很远，有的还在第一线。要研究，有的要搬，有的要建立第二个点，有的要分，一步一步地分。

要搞好整顿。重点企业一定要搞双重领导，以部为主，包括有的重点配套的小厂。规章制度要严格，军工企业更要严格。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制度要恢复起来，军工企业先搞。现在议论很多，要加以整顿，整理出一个条理来。国家的投资不可能有那么多，因此要有重点。当前对装备的中心要求是质量。现在还有随便乱改装备的问题，愈改愈坏。有了这个机构，就要由它来专管。一方面要广泛征求意见，另一方面该决定的就要作出决定，决定要经过军委批准。

最后强调几点：

一、要很快把科技装备委员会定下来，确定它的成员，明确它的任务。

二、要提出一个装备战略要求的目标，分清先后缓急。这样，科研和生产就有了方向。

三、国防工办要整顿。必须把军工口各部的工作管起来。干部的问题国防工办也应该抓，重点企业的干部和部的干部要管起来。

四、各军工部要由国防工办领导起来。由罗秘书长<sup>[3]</sup>召集国防工办和各军工部的领导同志开会说清楚。王震<sup>[4]</sup>同志也参加。

五、规划要研究，分三年、八年、二十三年。第一步是三年之内的，要把国防工业整顿好，关键是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抓好干部的配备。要配备内行的有事业心的人来抓工作，包括技术人员。过去说人家“臭老九”<sup>[5]</sup>，看不起人家，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些人年龄大，做科研工作不行了，可以搞科研管理工作，也可以当教员。科研人员和教育人员可以交流，也可以当厂长、总工程师等。学校一定要有校长，研究所要有所长。一个单位要配好三个人，一个是书记，一个是主管业务的，一个是管后勤的。国防工业的企业也有一个班子的问题，要注意把班子配好。要深入到基层企业去看一看，有符合条件的同志就应该提起来。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讨论军队装备和国防科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由邓小平召集的。

[2] 指中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

[3] 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

[4]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分管国防工业。

[5]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诬蔑为“臭老九”。

# 国防工业部门要尽快 建立岗位责任制<sup>[1]</sup>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

整顿国防工业，岗位责任制要赶快建立起来。没有岗位责任制，什么事都找党委，党委哪能管得这么多！工程师不顶事了，车间主任也没有责任了，总工程师也不签字了。质量问题那么严重，老出事故怎么行？以后飞机出厂，总工程师要签字，技术上要负责任。不建立岗位责任制，出了事故找负责的也找不到。有些质量事故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判刑。在恢复制度方面，特别是岗位责任制方面，军事工业部门应该走在前面。工厂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研究所里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要搞这个制度，否则，没有责任制嘛！要恢复各种制度，恢复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岗位责任制。要从工作需要出发，要很好研究，哪一些是需要的，赶快恢复起来。没有岗位就没有责任。现在质量那么差，总得有人负责，关键在建立制度。“四人帮”打倒了，现在应该搞了。质量没有搞好，党委有责任，但总工程师管技术，应该把责任加在他身上，有职有权，出了技术问题就找他，唯他是问。飞机质量不好怎么能随便出厂？不讲质量，工厂生产也停了，工资也开不出。说有些原材料质量有问题，不合格的你们为什么要收？宁愿不生产也不要收不合格的原材料，这样就迫使原材

料要保证质量。

要把制度恢复起来。要有人负责，要有必要的奖励。按劳取酬，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往往是青年出的成果多，发明创造多。要有奖惩制度，出了质量大事故要给刑事处分。好的工程师要放在重要岗位上，当得好，称职，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提级嘛！提级就长工资。科学院把陈景润<sup>[2]</sup>提为研究员，还提了两个副研究员，这在国外反应很强烈。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不从制度着手，产品质量搞不好，事故消灭不了。当然，不是说马上要百分之百消灭，这是不现实的。但总得减少吧！现在质量事故太多了，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原来质量过了关的飞机，过了关的坦克又出现大量质量事故，这怎么行？你们国防工办要找各个部好好研究管理制度，特别是岗位责任制。要搞出一套制度来，彻底改变质量事故多的局面。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人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2] 陈景润，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对解析数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居世界领先地位，研究结果被誉为“陈氏定理”。

#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次军委会议，充分肯定了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认为那次会议是正确的，是一次重要的会议。那次会议，涉及的内容很多，主题是讲整顿。当时设想，从整顿着手，也就是先从调整配备领导班子着手，把军队整顿好。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解决装备问题，因为装备问题不抓不行。再就是战略问题，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

这次军委会议，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sup>[1]</sup>，还要通过九个决定、条例<sup>[2]</sup>。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这次会议，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这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很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作决定，大家举手赞成容易，可是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有的事情原则上赞成，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高级干部办到了，全军就容易办到。高级干部办不到，就会一风吹，一切照旧。

下面我讲五点。

### 一、关于揭批“四人帮”和整顿领导班子的问题。

军队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总的情况是好的。多数单位的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发展是健康的。但是有些单位的运动没有深入下去，有的刚刚开始揭问题，有的问题不少，拖着不解决，有的还在捂盖子。总之，发展是不平衡的。运动没有搞开的单位，首先是要领导带头，放手发动群众，不要用框框来束缚。因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你晓得有什么问题呢？运动搞得比较深入的单位，领导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注意掌握政策。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所以，这一点对于军队极为重要。对犯了错误特别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一定要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并给他们创造条件，改正错误。要帮助他们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错误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的谅解，然后给以适当的处理。不能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揭不批，让他们滑过去。如果这样，会留下后患，以后还会闹“地震”的。而且这也不是真正爱护干部，是害了干部，因为他自己得不到教训。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些人，滑过来，滑过去，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就是没有得到教训嘛。对“四人帮”的死党中死不悔改的人，毫无疑问要坚决打击。“四人帮”的死党和他们帮派体系里的人，有的愿意改悔，而又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罪行，并且证明说的是真话，对这种人应该实行从宽处理的政策。对那些错误严重、态度又坏的人，不能重用，也不应该保留他原有的级别和待遇。

在调配领导班子时，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当然不能让他们进来。那些风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还有些人也不能进领导班子或者不能重用，例如，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抢的（当然不一定是大干部，“四人帮”用了那么一些“小螃蟹”，专门搞打砸抢，还搞特务活动，安“钉子”）；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等等。就是说，我们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只注意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没有牵连的问题还不够。还有另外一种人，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或者有点牵连也并不大，但是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实际上是坏分子。这种人不仅不能进领导班子，也不能留在军队。现在有些领导同志对这类人认识不够，要引起重视。这里不单是指选老干部，选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可得要选准，因为将来是他们当家啦。选得不准，教训不少啊。

我们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对于那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很好，只是在一段时间做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的同志，应该通过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所谓历史地看干部，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也要看他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的表现。有的人先是跟着林彪，后来又跟着“四人帮”干坏事、犯错误，这也是历史嘛！我们军队的老同志很多，总的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朴实、正派。当然现在也有少数人有点变罗。所以，看人是不容易的啊！一

定要在斗争中观察、识别干部，选择得当。

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一九七五年我提出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经过两年的实践，特别是从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看，软，就是怕字当头，丧失原则，顶不住，跟着别人跑；懒，就是意志衰退，不读书，不看报，不动脑筋，不下部队，好吃懒做；散，就是争权夺利，搞不团结，捏不到一起。有的人老以为自己一贯正确，闹新的山头主义，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好恶作标准来看干部，对自己好的就拉过来，不好的就排挤，总想自己搞一帮人，总以为不搞一帮人就办不成事情。这些年，有的人就学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套。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迅速改变软、懒、散的状况。

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新的编制也没有很好解决；在执行规定的编制时，更没有要求大家注意精简，不许超编。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现在一提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增加机构，增加人，这不行。还有的从下面抽人，搞这样那样的办公室。为什么原来的

机构不用呢？当然也有的原来的机构不能用，要抓紧调整。这次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以后还有没有精简的问题？还有。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当然，这次精简以后，定额确定以后，就要稳定一个时期。

现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流，除个别人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着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级干部，还有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选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

## 二、关于形势问题。

国内形势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大意，还要看到困难，看到问题，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的地方问题成堆。有了正确的方针，还要有有力的措施，有效的政策，继续解决存在的问题。军队也是这样。当然，我们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们认真对待，一定可以搞好。在小组讨论中，有的同志说，如果搞得好的，也可以争取早一点把军队整顿好。我也相信这一点。军队有一个长处，它是很集中的组织，行动起来快。

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sup>[3]</sup>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

发。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抢时间。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应该说，现在我们能打。首先，要抓紧把工事检查一下。要准备弹药。打仗没有弹药毫无办法。过去我们的弹药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现在要是打起来从哪里缴？所以自己要搞后勤。不管现在打也好，将来打也好，都要有工事，有弹药。还要抓紧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提高士气。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能够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对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对我们的备战工作，都是有利的。这里我想说一下，即使能够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那时我们同敌人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也仍将处于劣势。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嘛！因此，到那个时候，如果打起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

要有充分的信心。

总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一点我们可要有自知之明。指挥现代战争，随着我们装备的现代化，我们的干部包括在座的老同志，指挥能力够不够？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新的武器装备一来，行不行呀？懂不懂呀？指挥能力够不够呀？就是自己行，下面的人行不行呀？你不训练，就是不行。所以要努力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是一点。再一点是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但这里有个条件，请大家注意，就是要根据可能。国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弄得好一些，就可以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

### 三、关于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的问题。

军队的教育训练，有两个决定，一个是对学校的，一个是对部队的。在这里我不多讲了。现在的问题是，军队本身要加强教育，加强干部训练。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军队有些干部到地方不大受欢迎，也确实不像过去那样顶用。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新的条件下，我们重新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有几十万干部要转业。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工作中断了两年。今后每年也将有大批干部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从军事战线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呢？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在教育训练上要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说，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

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就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

对干部的教育训练，要使他们学好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懂得现代战争知识，有好的思想作风，有强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还要使他们学点搞工业、农业的知识和必要的现代科学知识，学点历史、地理、外语；有条件的，还要使他们学点专业技术，比如开汽车、开拖拉机，并且懂点原理。我们军队里具有多种知识和一定专业技术的人以后会慢慢多起来。这些问题，主管教育训练的部门要作出规划，提出落实的具体措施。毛泽东同志提倡干部学多种知识。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得一些干部知识很简单，有些还学坏了，到地方不太受欢迎。我们在教育训练中给干部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这对国家建设有利，对军队建设和战备也有利。

当前，有一大批干部要转业到地方。对这些干部，需要办训练班，组织参观，请地方同志介绍经验，让他们接触工业、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知识。凡是要转业到地方的干部，都可以这样做。

军队每年有上百万的战士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要求每一个战士都要学到。如能调配适当，组织得好，学到那么一点知识，就很有用处。毛泽东同志曾要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学文

化，做社会调查。现在的战士，中学生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如果在服兵役期间，经过训练，水平提高了，作风又好，到地方就会发挥很大作用，地方上也就比较欢迎。

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现在一个团的干部到工厂，不要说大工厂，就说中小工厂吧，当个厂的领导行不行？看来有些人可能不行。按资历来说，能指挥一个团，如果好好学点知识，学点本领，锻炼一下，当个中小工厂的领导，大厂的车间领导，应该说是可以的。要创造这样的学习条件。当然，到地方也可以学，也可以做政治工作，做管理工作，但不能都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容不下嘛。总要有一些做技术工作的，所以要学会多种知识。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干部不会管连队。好多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讲过。团的干部、师的干部怎么样？不少人也不大会管理部队。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全国刚解放的时候，好多北方的干部到了南方，我们有些连级干部去当县委书记，当得不错嘛。那时有个条件，就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作风好，不浮夸，听指挥，能执行上面的指示、命令，即使文化水平不高，工作也能胜任。现在不同了，军队有些干部相当老大，自己觉得了不起。一九七五年我讲过“雷锋叔叔不在了”，“四人帮”对此大肆攻击、诬蔑，其实这不是我的话，是老百姓的话。政治工作本来是我们军队最擅长的，现在有些人到了地方却不会做政治工作。所以，军队的教育训练要为干部到地方工作创造条件。

你不在军队里创造条件，到地方上就不受欢迎。当然，地方上也有安置不当的事，地方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 四、关于纪律问题。

这个问题有个专门决定。我想再强调一下。

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最后几年，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亲自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是好多同志都知道的。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八大军区司令调动<sup>[4]</sup>时，十天都到了职。毛泽东同志是相当了解这几年军队的状况的。纪律问题一九七五年提过，并没有解决，又耽误下来了。要重申这个问题，这是传帮带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现在有些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这就是不守纪律！有的单位，个别人长期闹派性，有恃无恐，老虎屁股摸不得。为什么摸不得呢！有些干部调动工作，不合乎自己的要求就不服从命令。有个单位一九七五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有意见可以提，可以保留。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当然，决定一项事情，领导上要慎重，要注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命令是要执行的，指挥是要服从的。过去有好多派，闹派性，处理当然要慎重。以后不能以这个问题为借口，要严格军队的纪律。还有一些住大城市的，特别是在北京

的干部，工作调动了，三令五申，家就是不搬。这怎么行呢？一般地讲，到哪里工作，家就应该搬到哪里嘛。

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对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军队干部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首先要从老干部开始，带头遵守纪律。前面讲了，一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是自觉遵守纪律。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当然，我们军队也要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我们军队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我们是党委领导，党委本身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是委员会嘛，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重要的事情党委要好好讨论。党委内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有这种风气。我们高级干部应该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尽管党委本身有党的生活，可以起到互相监督、互相勉励的作用，但是，党委要很好注意高级干部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在连队，支部要发挥很好的作用，三大民主要坚持。政治民主当然要搞好。军事民主，教育训练方面，要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学习现代化科学知识，确实有好多要兵教官。兵里面有些人，科学知识比连长、指导员多，就得请他当教员，特别是技术部门。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现在有些干部侵占战士的利益，这是不允许的。部队有经济委员会，要把这个组织好好健全起来，发挥作用。政治工作就要管这个事，要组织人查账，要每月公布账目。搞好三大民主，要从连队搞起，从各级党委搞起。

##### 五、关于团结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

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我们这些人不会没有缺点，有缺点要允许人家批评。我们这些老干部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好样子来。当然这是说批评，不是说造谣诬蔑，攻击谩骂，那是不许可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共同揭批“四人帮”。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团结犯错误的好同志。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现在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搞小圈子，很值得注意。有些人调走了，还干预原来单位的工作，还去插手。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有什么必要呢？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的人口头上讲团结，而把党委内部一些不同的意见捅出去，加以歪曲，散布流言蜚语，拉一部分人支持自己。还有一些人喜欢搞挑拨离间。这些都是破坏团结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为了贯彻党的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们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是大局，我们要有这个大局观念。

这次会议赋予我们的任务很重，时间紧迫，要加强领导，做好规划，狠抓落实。首先要抓紧把各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好。这样，才能保证全军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 注 释

[1] 十项战斗任务是：（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研究和军工生产，加速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简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

针，加强后勤战备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2] 九个决定、条例，指《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

[3]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

[4]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在毛泽东建议下，决定调动八个大军区司令员的工作。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 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 代表团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

这次人大会议体现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些问题更具体化了。最大的问题是在本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就能澄清好多问题。要恢复和发扬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创立的一套好作风。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在哪里？一个大学生连一道数学题都答不出来叫优越吗？空军停留在歼六的水平叫优越吗？海军就那么一点大叫优越吗？农民没有饭吃叫优越吗？“四人帮”不讲这些，不讲生产。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讲生产能行吗？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要物质极大丰富。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光喊口号没有用。四个现代化和十年的目标要很好地争取，是可以实现的。这是经中央再三考虑过的，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雄心壮志是树立了，还要有条鞭子天天鞭策我们才行。但是，只要经过扎扎实实的工作，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现在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农业。农业不发展，不能实现粮食年产八千亿斤的目标不行，不然还不能满足人口增长

的需要。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不够，也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不注意人口的增长也不行，要抓好计划生育。我们在肉食、水产方面要多搞些。就粮食来说现在并不多，如果农业搞不好，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再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会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技术水平低，在工业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如长春汽车制造厂，每年生产五万辆汽车，只要加强管理，决不止造现在这么多。现在看来，八级工资制<sup>〔1〕</sup>还是要恢复。岗位责任制也是很好的。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管理也是有科学的，搞个自动化流水线就不简单。农村除了政策要对，也有个管理水平问题。越是机械化越要管理好。拖拉机开几下就坏了，或者不会开，出事故，这不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这确实要有专家，要一批一批地把外行变成内行，把半内行变成全内行。这不能弄虚作假。

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离开这三化就谈不上国防现代化。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性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工厂、农村、商店都有科学技术。工厂里要办业余技术学校。过去不少，这几年没有了，大家没有兴趣了。谁搞就是走白专道路，就要挨批。这种状况要改变。

此外，讲讲风气问题。现在不是都在讲作风吗？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待事情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行吗？没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行吗？没有艰苦朴素行吗？军队好是作风好。比如过去打仗，宁可少报战功也不多报。谎报战功要杀头。你看这简单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老老实实，不能弄虚作假，自己欺骗自己。不能把打了败仗说成

打胜仗，打半胜仗也不能说打胜仗。现在风气不好，是林彪、“四人帮”搞坏的。历来树立毛主席培养的好作风是军队带头的。不是叫“宣传队”、“播种机”吗？是军队把好作风带到地方，从长征开始以后就遍及全国。毛主席培养的好作风是由军队、根据地的干部带到全国去的。现在要发扬这些作风，这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军队要恢复过去的好作风。艰苦奋斗，军队要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要从老同志做起，把作风带好。军队有希望，因为还有这些老同志在。军委会议定了些章程，搞了九个文件<sup>[2]</sup>。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再搞点章程。有了章程，那就要老老实实执行。军队如果搞得不好，肯定会在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中起很大作用。全国人民对解放军的希望是很大的。

## 注 释

[1] 八级工资制，指全国解放后国营工矿企业实行的工人工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工人的工资分为八级。

[2] 九个文件，指《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

# 为军事科学院题词<sup>〔1〕</sup>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邓小平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的题词。

# 做好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sup>〔1〕</sup>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sup>〔2〕</sup>是好的，这次写决议要把好的内容都吸收进来，把林彪<sup>〔3〕</sup>塞进的私货去掉。那个决议连队工作讲得多。连队工作是整个军队工作的基础，一定要搞好。连队工作的重点是支部，但不只是支部，还有其他工作。这次决议稿写得比较简练，但不够全面。这个决议要写全面一些，要把古田会议<sup>〔4〕</sup>以来政治工作总结的全部好的经验都写进去。过去好的东西，全文引用都可以，要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有些内容要突出，要充实，要强调。军队要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写上，奖惩制度也应该写上。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心就是要把决议搞好。这个决议要作为今后学习和检查的主要文件，以后大家看这个决议基本就可以了。报告要把决议的重要之点抽出来，加以阐明发挥，这样报告就有力量了。

报告稿我看了一下，有的部分比较重复，理得不清楚。报告对保证训练的质量没有讲，政治工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院校提了一句，不够。院校很重要，要起集体干部部的作用。揭批“四人帮”篇幅过大。现在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很多了。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看主要是揭批得不够，处理得不

够，真正搞透的单位不多。“四人帮”的毒害可以概括地讲，主要是讲揭批“四人帮”的深入问题，处理问题。报告不一定面面讲，思想要解放一下。报告就是要有针对性，要抓住重点，抽几个问题展开讲，集中讲，讲透。

报告要更多地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怎么做，全军指战员怎么做。要讲清楚新的条件是什么，在新的条件下，应该怎么讲纪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提高战斗力，怎么发扬优良传统。每个问题都有新条件，军内军外都有新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三大原则<sup>[5]</sup>中的敌军工作现在讲不出很多内容。但在新的条件下，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过去不同了，怎样把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搞好，有许多内容可以讲。在新的条件下，上下关系、军民关系都要搞好。现在军队侵占地方土地、房子的问题要注意纠正。驻军应当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军民关系新的内容。有些事情我们并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主要是帮助搞劳动，帮助公社装电灯、安电话，帮助训练赤脚医生<sup>[6]</sup>，帮助训练民兵。发现不良倾向，军队可以帮助解决。但是，如果打派仗，军队不能参加，要调解。发现问题，可以向县委、省委反映。有的人选得不当，也可以反映，军队有这个责任。

现在政治工作内容比较复杂，教育训练也和过去不同，比较难做。连队也有新的变化，现在连队工作对象不同了，干部也和过去不同了。干部过去打过仗的多，现在打过仗的少了，再过一段时间连军级干部也没有多少打过仗的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出战斗力？我们历来讲政治工作要出战斗力，光嘴巴讲不行，现在会讲的人可多了，要扎扎实实地做。政治工作要保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过去打仗的时候很明显，现在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提高

战斗力？无非是加强纪律，加强训练，培养作风。作风出战斗力，艰苦奋斗出战斗力，纪律出战斗力，苦练出战斗力。过去练四大技术<sup>[7]</sup>出战斗力，现在情况不同了，装备不同了，要掌握现代化战争知识，要一兵多能，干部要指挥现代化战争。在这些方面，报告稿也好，决议稿也好，都接触不多。决议、报告就是要解决在新的条件下政治工作怎么做。

报告要集中讲干部，讲作风。要把马克思主义者应具备的标准讲清楚。选干部，不要选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要选扎扎实实的人，艰苦朴素的人，联系群众的人，以身作则的人，不要光看口头讲。不以身作则行吗？一个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能带好一个连队吗？军队的工作基础是连队，要从连队起就选好人，慢慢就上来了。过去联系群众很自然，天天看到的是自己的部队，不要说连队干部了，师团干部也天天和战士在一起。现在不同了，干部联系群众少了，所以更要强调联系群众。决议对三大民主<sup>[8]</sup>讲得不突出，要充实，要强调。过去干部侵占战士利益的很少，现在很普遍，战士看得清楚，解决不好不行。

现在战士文化程度高，这是个好的条件，但政治工作比较难做，这样思想工作更要做好。现在有的战士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部队纪律不好，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搞打砸抢有关，有的人动不动就“造反”，就“反潮流”，动不动就“对着干”。要强调纪律，更要发挥战士的积极性。要形成一个好的风气，特别是干部要有好作风。干部要会做工作，简单化不行，不讲道理不行。讲纪律，更要讲在自觉的基础上执行纪律，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这样才能加强组织纪律性。还有个奖惩问题，当然重在表扬，但应该有奖惩制度。我们还要提倡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有些战士文化程

度比干部高，有些课可以叫战士上，有的指导员讲课不一定比战士讲得好。

干部服役条例基本可以，有的内容还要修改。顾问的问题没有讲清楚。作战部队的干部要年轻一些，最高服役年限我基本同意，会上大家要议一议。干部年轻一些，对部队建设有好处，对复员转业也有好处，年轻干部到地方比较好安排。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要作风好，艰苦奋斗，能上能下。要既能管好军队，又能做好地方工作，再加上学习一些相应的本领，这也是新条件下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下，要强调一兵多能，干部多学些本领，转业以后工作就好安排了，就能较快接上工作了。军队干部如果思想好、作风好，转业后会做政治工作，会做管理工作，地方也会欢迎。现在地方干部相当多，转业干部不好安排，也是一个原因，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你说现在人多了吧，但又缺成百万科技人员。将来生产和科技事业发展了，要有几百万科技人员才行，军队每年出去十几万干部，问题也就不大了。

今明两年，要把五十万干部转业安排好。工作要认真做，安置要恰当。第一批转业干部安排得低了，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座谈修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时的讲话要点。

[2] 指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3] 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

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4〕古田会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九月二十八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次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如何建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5〕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指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6〕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农村脱产卫生员或半农半医卫生员的称呼。一九八五年一月，卫生部决定不再使用这一称呼。

〔7〕四大技术，指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

〔8〕三大民主，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

## 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sup>〔1〕</sup>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军工厂平时以民用养军用。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要断掉这条路。为了搞材料，四处派人拉关系，这样有的坏分子混进来了，军办工厂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戈壁滩或边远地区的部队也不准办工厂，有困难可以搞点合法补贴。需要办的，经过批准应集中在大军区、军兵种办。军以下部队不办工厂，这是军委全会定的<sup>〔2〕</sup>，这一条不能变。现在后勤工作就是要抓具体，军以下部队一律不准办工厂，要坚决执行，不管什么理由。军队的农副业生产要搞好，以工养农的说法是不对的。新兵入伍、野营拉练、施工建设，粮食不够吃，搞生产就是为了补助粮食不足。军队就是要锻炼吃苦，不然培养不了好的作风。

大政方针军委全会都定下来了。军委全会有许多决定是要后勤办的。后勤会议就是要按军委的决定，制定具体的办法、措施、制度、章程。要从整顿财经纪律着手，整顿后勤，给部队带来一个艰苦奋斗的作风，人人要遵守制度。

营房调整，现在是全军看北京，北京看三总部，三总部要带好头。一定要狠抓，一定要严格，做到人走家搬。不搬的要按地方规定收房租。

武器装备质量不合格的，部队不收。武器弹药的储备太集中了不行，容易遭到破坏。轻武器采取分区储存，战时就地动

员、就地装备部队，这个办法可以考虑。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领导同志关于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筹备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2〕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决定指出：军以下部队不办军办工厂，现有工厂产品确属部队需要，或产供销能纳入计划，生产条件较好的，可有计划有步骤地收归军区、军兵种统一经营管理。

# 把军队政治工作的 地位恢复起来<sup>[1]</sup>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

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军队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从制度上说，总的是管理松懈。我们不是没有章程，现在是有章不循。有章不循，等于没有。我去年要空军搞两个大检查<sup>[2]</sup>，空军做了。其他单位总听到了吧，但就是不做。总认为自己没有那样的问题，其实有的是自满，哪个军兵种不应该做！不抓住一些事情检查，责任心提不起来，没有约束不行，凭资格吃饭不行。

全国要搞考核，军队干部也应该考核。过去打仗是考核，是最硬的考核，标准很明确，很容易考核。现在不打仗，更要严格进行考核。考核中有宽和严的问题，有奖和惩的问题，有升和降的问题。决议和报告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干部要做好样子。有些人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还是原职、原薪。对这些人不作为“四人帮”的骨干处理是可以的，但不能还占着位子，应回到原来岗位，回到生产中去。庙就是那么多，他们占了位子，老干部复不了职，真正好的年轻干部也提不起来。这些人能量不小，惯于看风使舵，吹吹拍拍，学会了林彪、“四

人帮”那套，搞打砸抢，还叫他们占着位子不动，行吗？当然不行。全国有这样的问題，军队也有这样的问題。有些人提升得不当。总政应该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如有些人错误很严重，不敢动，这样就没有是非了。有些人是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死党一下提起来的，表现不好，为什么不叫他们回基层？为什么不处理？

要看到，军队的问题要整顿好，还要费很大的劲。整顿要从严，没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纪律，整顿不起来。有些人，整一整对他本人也有好处，是从政治上爱护干部。军队要从严，不从严，军队搞不好。只宽不严，只奖不惩，只升不降，不好。要改变局面，就要严。要严格纪律，严一段再说。我们现在官太多，搞得很臃肿。有些干部为什么不能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呢？我们现在是铁饭碗，干部提到了哪一级，就是搞得不好也没有降的问题。干部要有奖有惩，有升有降。干部服役条例，这一条没有讲明确，要体现出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整顿要从严，干部要考核，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提出来研究解决。

第二个问题，要把平时怎么样提高战斗力讲透些。勤学苦练，熟练掌握手中武器，一兵多能，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些东西。作风出战斗力，知识出战斗力，艰苦奋斗出战斗力。勤学苦练也是艰苦奋斗，要展开来讲。哪些方面出战斗力，平时怎样培养战斗力，要好好研究。

第三个问题，要强调干部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大。过去打仗，要苦大家都苦，现在有的干部总是想舒服，作风不深入，不以身作则。要强调干部的模范作用，特别是高级干部。过去反对走马观花，现在走马观花的人也不多了，作风实在成问题。

政治干部更应以身作则。有些政治干部，不懂业务，政治工作怎么做？为什么政治学院的军政教育还要四六开，就是要政治干部学一些军事知识。政治干部不懂业务，不懂技术，不懂行，做不好政治工作。在空军，你不懂行，怎么能保证指挥质量？怎么能保证驾驶质量？怎么去考核部队？在坦克部队，你不懂得坦克，怎么知道坦克合格不合格？总要懂得才能发现问题嘛。过去打仗的时候，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一起指挥，现在不学习，不懂业务技术，怎么出战斗力？文件中可以讲一讲人与物的关系。

总之，文件要加的内容，一个是考核要形成制度，核心是有升有降；一个是怎样出战斗力；一个是以身作则。要着重注意年轻干部的成长。

军队办成大学校的问题，要展开讲。要给干部到地方工作创造条件，要组织干部到农村、到工厂去参观，接触农业，接触工业。

政治工作要保证纪律、制度的执行。现在执行编制的问题不少，要检查，要列为政治工作的内容。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应该辩证地看这个问题。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提法没有错，但还要讲思想革命化。要从实际出发，在一段时间里，忽视了抓业务，就要强调业务；在一段时间里，忽视了政治，就要强调政治。政治工作既要讲领导作用，也要讲保证作用，总之是又红又专。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把政治工作的地位恢复起来。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座谈修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时的讲话。

[2] 指飞机普遍大检查和技术普遍大检查。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听取空军汇报时指出：“你们停下来好好检查一下，要检查飞行员的原因、飞机原因、指挥原因，要好好进行整顿，不然风气搞坏了。飞机要普遍进行大检查，技术要普遍进行大检查。”

# 对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批示<sup>[1]</sup>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

所有军垦农场，要坚决走机械化道路，要努力保证高产。

邓小平

五月十二日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关于对城西湖农场增加生产兵力的意见》上的批示。

## 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sup>〔1〕</sup>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

我们军队的状况，还是一九七五年讲的，就是三种状况：软、懒、散；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总参的“肿”是很严重的。我可以肯定，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两年能解决得了的。但是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总得有个目标嘛。

我们搞指挥系统现代化，从自己落后的方面去看看人家的，找一找差距，很有必要。杨成武<sup>〔2〕</sup>同志去法国看了，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打起仗来和过去一样光靠电话吗？天上的通信卫星这些东西，可不要小看。前不久我看到美国的一个资料，说到使用电子计算机，开始军队不接受、不赞成，说是不懂，掌握不了。后来，美国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去搞，现在装备到团以下，陆、海、空军都用上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费劲的，但思想要统一，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要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

要解决一个“肿”。机构臃肿、庞大、重复，不好。人员减少了，指挥才灵便。过去各总部工作都很灵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文件，搞得这么繁琐。现在编制是定下了，是不是这样执行了？就是这样也是一个“肿”的编制。

编制定了暂时就不动了，但目标是指挥系统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一定要研究解决，因为它与军队现代化密切相关，如不解决，装备技术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这样庞大的组织，里面都有什么问题呀？听说各个部门都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是非问题没有解决，班子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不能只要求部队去做，首先是总参、各总部、军兵种要抓紧解决，你们解决好了，才有资格发号施令。这个问题要提到议程上来，不是现在马上解决，但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

“三查三整”<sup>[3]</sup>搞什么？总是要分清是非。各级班子要搞好，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不深入的问题。现在走马观花也不多，深入下去就更少了。军队的工作要做个好样子，要提高工作效率，雷厉风行，紧张快干。空军的经验证明是可以快的。快也可能出问题，但总比慢慢腾腾好。如装备委员会提出了武器型号，提出来就好。我还打算找生产、使用部门谈谈，这样比几年来拖着不解决要好嘛。不规定生产的数量质量、不分轻重缓急不行。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2]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

[3] “三查三整”，指一九七八年五月，总参机关继空军之后开展的活动。三查即查斗志、查纪律、查工作学习；三整即整掉“软、懒、散”，整掉官僚主义，整顿文风。

# 实事求是是 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sup>〔1〕</sup>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sup>〔2〕</sup>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也不一致。就是说，这两个提法和毛主席、华主席的提法不一致。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二个问题，要讲不破不立；第三个问题，讲以身作则。着重讲第一个问题。

实事求是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对马列主义理论、

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发言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但决不能因此不承认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也经常告诉我们，你们讲话也不要多引我的话，要照你们所管的地区、所管的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办事。毛主席讲的话，总是有时间、有地点、有条件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开会也好，作决议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实事求是。

我们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这次要开，可以是两种开法：一个办法就是照抄已有的东西，从头到尾抄到底，这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势必导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另一种办法就是要研究一下现在的状况，现在的问题，现在的组织，现在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制定方针。毛主席关于建军的一些基本原则，仍然有效。但是，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方针、具体办法，要同现在的情况密切结合起来。现在和过去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过去是战争时期，现在是平时时期，很多新问题都出来了。基本原则，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sup>(3)</sup>的精神，人人都要执行，但现在新的情况出现了，解决军民关系就与过去不一样了。比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过去是个体经济，现在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了，虽然精神一样，都是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但内容不一样。现在是军队不要损害集体利益，不要损害国家利益，而且要帮助所在地方发展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经济，发现损害

集体、国家财产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起码要立即向上级报告，起来维护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拿一个连队来讲，现在当兵的人和过去当兵的人不同，过去是贫下中农当兵，现在是学生当兵。学生兵的思想同过去的贫下中农兵的思想就不一样，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也就不能一样。过去搞忆苦思甜，现在单靠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还要针对具体思想情况做细致的教育工作。现在的干部同过去也不一样，现在有复员转业的问题，干部可以带家属。这些问题过去没有，还用过去那套办法怎么解决得了呢？还有，拿后勤来说，现在的后勤究竟应当储存什么东西？各种东西各储存多少？手榴弹储存久了就不能用了，手枪、步枪储存太多了也不行，但一些必需的非储存不可。过去是打到哪里，就在哪里解决，武器的来源主要在前线，现在就不同了嘛。后勤中财务会计制度等等，也都有新的问题。这次会议，我们要注意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情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分析现在的政治工作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总而言之，要讲实事求是。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们有很多年轻同志不懂得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道理了。问题是从林彪<sup>[4]</sup>搞语录开始的。林彪这样一搞，反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出来了，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所列举的党八股的八条罪状都出来了。八条罪状最后一条说的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我们的管理，我

们的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现在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是空的。

第二个问题讲不破不立。有人提出新的发展时期是从十月六日开始，又说我们现在只能批“四人帮”，不能同时批林彪。如果既批“四人帮”，又批林彪，就叫双箭齐发。这也反映了一种思潮，就是有些怕就是了。军队不批林不行，不批林彪对军队的破坏和在军队中的流毒，我们这个军队就不可能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实际上，“四人帮”同林彪是一伙，现在林彪的那一套还在起作用。两个都要批，只有彻底地批了，也就是破了，正确的东西才能立起来。现在不愿意批林的人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不联系实际，搞公式主义、形式主义；还有一种就是怕批林惹火烧身，批到自己头上。

第三个问题讲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在军队的各级中都非常突出。有些老同志现在就是追求享受，愈多愈好，愈高愈好。如果他们不带头，什么事情都很难办。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一个连的连长、指导员也是一样，你如果不带头艰苦朴素，不做出一个榜样来，你这个连队就带不出好的作风。现在有些干部意志衰退的情况，很值得严重注

意。

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有人说我的讲话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事都不是孤立的。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就准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有关负责人的谈话。

[2] 华主席，指华国锋，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八〇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3]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4] 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同志们：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草案。这些文件经过军委审定之后，军队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思想，针对部队的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很好，很必要。这次会议，中心突出，主题明确，精力集中，越开越好。会议的风气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对原则问题又不含糊，给下边作了好样子。总之，会议开得很圆满，很成功。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

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sup>〔1〕</sup>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

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sup>[2]</sup>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sup>[3]</sup>“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sup>[4]</sup>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争的指导原则的时候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sup>[5]</sup>我们过去打仗，都懂得不研究我情敌情，做不到知

已知彼，就要打败仗。

但是，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就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文献。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他说：“‘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6〕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7〕。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8〕。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9〕。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0〕。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11〕的第一项。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反复多次地讲了这种观点，这种作风。例如，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说：“中央领导机关

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sup>〔12〕</sup>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sup>〔13〕</sup>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sup>〔14〕</sup>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又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韦国清<sup>[15]</sup>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呢？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研究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sup>[16]</sup>，就曾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开始规定了三项纪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的内容后来也有变化，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到一九四七年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也有修改：“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

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在农村，过去是个体经济，现在是集体经济；部队过去在农村，现在不少部队进了城市，住了营房，这就是新的情况。现在搞好军民关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军要研究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两个公

社，附近有工厂的也可以研究如何帮助工厂。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韦国清同志的报告中对部队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作了分析。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忆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就官兵关系来说，现在同战争时期就不同，怎样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要很好地研究。

后勤现在也在开会，也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比如，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作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战争物资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需要认真具体地研究。另外，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现象作斗争。

以上讲的，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分析了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和解决政治工作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

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sup>[17]</sup>，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军队揭批“四人帮”总的情况是好的，我不多说了。但是运动的发展不平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搞深搞透，进行到底，决不能捂盖子。

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

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sup>[18]</sup>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账”的问题。

要增强团结，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这正是为了分清是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搞好团结。这样才能真正团结绝大多数。跟林彪一伙犯了错误，检查得好，真正改了，一直表现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充分信任；坚持不改，又跟“四人帮”干坏事的，当然要从严处理。不这样做，就分不清是非，就搞不好团结，就无法实现整顿的任务。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

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有的单位问题成堆，老是解决不了，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真正调整好。要坚决执行军委会议关于哪些人可以进领导班子，哪些人不能进领导班子、不能重用的规定，抓紧把各级领导班子选配好，整顿好。一九七五年我们讲过软、懒、散三种情况，现在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这个问题。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

军队的作风要做个好样子，就要解决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

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军队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整顿，还有一个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的问题。我们多次讲过，要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这次会议之前，我又讲过，通过这次会议，要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起码要起这个作用。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整顿，一定要从严。不论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整顿政治机关，没有一股子劲头不行。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这个问题很重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现在，强调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必要。比如，调动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级干部不带头怎么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职，高级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也要高级干部带头。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近，不少单位领导干部开始下部队了，这是好现象。

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sup>[19]</sup>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总之，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

今天，后勤会议的同志也在。我要讲一下，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

议。要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在座的同志是责无旁贷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治委员要加强领导，亲自动手，狠抓落实。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全军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色，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

## 注 释

[1]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王明“左”倾路线，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3] 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4 页）。

[4] 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0 页）。

[5]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9 页）。

[6] 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版，第 801 页）。

〔7〕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0 页）。

〔8〕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20 页）。

〔9〕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7 页）。

〔10〕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7 页）。

〔11〕党的三大作风，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12〕见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13〕见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14〕引自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15〕韦国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6〕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17〕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18〕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19〕“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针对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而提出的。

# 解决武器装备问题要有 近期要求和长远目标<sup>(1)</sup>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今天找你们来，是要了解陆、海、空军究竟装备什么，将来要发展什么，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我要一个部一个部地谈一谈。

这些年科研停滞了，产品连原来的质量都保证不了。要和冶金部等部门协作。凡是航空用的原材料，无非是冶金部、四机部、化工部、一机部供应。你们提出要求，他们应负责办到。你们要组织共同攻关，共同努力，解决原材料和技术问题。条件不足的可以吸收外国的技术，买外国的东西。几个部门共同负责攻关，不准扯皮。如果扯皮，就把事耽误了。

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的技术。解决武器问题要有一个近期要求，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装备委员会提出多种飞机，近期要求和远期目标是什么？这里要包括我们科研能力和原材料的能力。总之是三个问题：你要求什么；有多大本事；解决问题的途径。要求是指近期和稍远一点要什么飞机，我们的能力如何加强。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任何一个武器装备问题，都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解决。

第一，确定战略目标。今天有些问题可以定，有些问题暂

不定。现在歼六确定为第一代，歼七大改后确定为第二代，同时搞歼八，技术过了关算第三代。第四代应当是什么？计委要搞综合平衡，什么时候搞什么东西，要得当。这个战略目标，还要包括轰炸机、强击机，要定一个规划出来。

第二，抓科研。科研要放在整顿工厂的前面，这可是个硬东西。就是学会引进的东西，也要靠科学研究，包括飞行指挥都有新问题，需要改进。引进谈判要考虑周到。今后谈判引进问题，空军、三机部、研究机关要组织一个专门小组，从头到尾负责到底。

第三，制定规划。根据这个目标，你们制定一个规划，开一个单子。一个机种的系列，也要包括引进规划和定点规划。引进什么？引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研设备，这是全国公用性的，是全民所有制，不能各搞各的，不要重复引进，计委要把关；另一方面是飞机和其他武器，这是行业性的，当然航空工业有特殊性。引进科研手段，不仅航空工业，全国也必须加速引进一大批。本来水平不行，也来不及做，而且质量又不好，引进是重要的手段。

第四，整顿工厂。关键是班子，是班子的能力行不行。要精选人才，这些人要有干劲，有专业基础。挑选出的人，可以先当副厂长、大车间主任嘛。你们部机关要搞卡片制度，每年考核两次，看搞得如何。要注意选拔这些人，将来由他们来当家。这些人中有四十岁左右的就不错，当然将来有三十多岁的更好。这事很重要。得靠善于管理工厂的人，不要很多，一个厂有几个人就行。以前我去苏联，尤金<sup>[2]</sup>告诉我，苏联的原子弹，就是三个四十多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要有尖子，技术上要选拔年轻人，管理干部也如此，干好了就提升。领导上要有意识地培养，有意识地提拔。国防工业各部门都要这样做。这

件事要打破常规，是要得罪一些人的，可能有人不满意，阻力不小。最近有人就贴出大字报，说什么“不重视工农兵”。对这些奇谈怪论就不要管。该办的还是要办，不要怕人家不满意。

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培养都要抓紧。中专实际上是培养高级技工。技工学校招初中生，要从教材上提高。要从现在起培养，不然引进的新设备不会用。要赶快培养，这方面可不能空谈。科学的东西不能弄虚作假，军工产品质量就是要百分之百合格，问题就可能出在百分之零点几上。现在还着手培养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就来不及了。你们要多派一些人出国留学，当然行，但大量的人才还是靠国内自己培养。我们自己要培养出大量有能力的大学生，还要八年，三年高中，五年大学。我提出重点大学招生要翻一番，如北大、清华，航空学院也是这样。航空学院又是研究机构，招生也要翻一番。利用原来的学校翻一番，比新建来得快。

国防工办重点是抓好协调，要搞综合平衡。重点执行放在部，要加强部的领导，加强部的权力。各个部要加强工厂的权力，今后重点是抓厂长。当然党委书记也要成为内行，党委不能只讲空话，要讲实际。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同志汇报航空工业情况时的讲话要点。

[2] 尤金，苏联哲学家，科学院院士。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 以民养军改造造船工业<sup>[1]</sup>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造船工业最大的问题是改造问题，要积极引进技术，不只是民用改造，军用的也要改造。六机部也不只是为海军，更多的是为民用。六机部提出八个字：“以军为主，以民养军”。以民养军，包括搞出口船，换取外汇。民用船搞多少，搞什么型号，也要规划出来。要大中小，要搞出口的，内河需要的。把民用船水平提高了，也可以促进军用船。方法是要大胆改造现有的造船厂。

各大学应该逐步建立研究中心，特别是清华、交大这样的学校应该很好地利用。支援和帮助他们搞科研，比新建一个大学好得多。

技术引进应当是全面的，一定要包括企业管理，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主义。要计划好。引进项目多花点钱可以。以军为主，以民养军，改造造船工业。江南厂、大连厂都要彻底改造，就是搞成新厂。我们造船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我们造的船应当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可以竞争过他们。中小型船人家不造，我们造。要多造中小型船出口，赚外汇，以民养军。长江、珠江和其他内河的需要量也很多，要多造内河船，充分利用我们的河流搞水运。总之，国际市场有出路，要有信心。

技术引进，点在哪儿？现在两个点，一个在上海，一个在

大连。第三个点选在哪儿？南海当然最理想了。大连厂在辽宁、天津等地区配套。江南厂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配套。第三点如果放在武汉，可在湖北、四川等地区配套。如果放在广州，可在广东等地区配套。要规划好，迅速定下来。

六机部对所属工厂要改造，队伍要整顿，要确保质量。开始慢一点，以后可以快一点，尽量不影响当前目标。整顿企业有两条，一个是班子，一个是管理，打乱仗是不行的。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管理要完全照外国的办法，编制人数不能超过。质量不好，根本不接收。凡不合格的都不接收，宁肯少，宁肯没有，也不要破烂货。军舰质量有问题，海军不接收是对的。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要寸步不让。质量不好，就是不要，拒绝接收。不能老说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有流毒为什么不肃清？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是过去的问题，现在要补救，要有改进措施。从今年起，对质量不好的军舰就不接收了。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第六机械工业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同志汇报造船工业情况时讲话的一部分。

# 加强军工企业管理，走 军民结合的道路<sup>〔1〕</sup>

（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二日）

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以军为主，搞军民结合。重点放在平时，至少拿一半转到民用，战时可以转产，这是一个大方针。现在军工企业生产能力这么大，不搞民品是不行的。

民用产品搞些什么，要好好研究。搞什么民品，要提个单子，请计委去平衡。几个军工部门都可以搞些建筑材料。现在城市住宅建设每年几千万平方米，还不算工矿企业的建筑面积，建筑材料需要量很大，国防工业可以出点力。总的方针是，至少拿出一半的人搞民用，将来自动化了，可用三分之二的人搞民用。这个道路是对的。不单是五机部的问题，三机部也有这个问题，四机部、六机部本身就是军民结合。

引进的项目要算得精细一些。国防工业引进什么，引进多少，占多大比重，要分轻重缓急。有的买产品，有的引进技术，要平衡一下。

我们有一个总的战略思想，仗可能五年打不起来，我们装备的重点是陆军、空军、海军。军工产品数量可以搞得少一些，但要把技术搞上去，把质量搞上去。要搞好技术储备，还要提高技术水平。现在到处叫电子、雷达、指挥仪，四机部要

赶快搞上去。电子计算机要普遍应用，电子计算机广泛运用起来，对国民经济有好处。武器装备要很好地解决“三化”<sup>[2]</sup>问题。型号要简化，凡是能通用的就要通用，不要太繁杂，枪、炮的口径不要太复杂了。炮弹要通用，不能型号太多，否则打起仗来不方便。这个方针要定。有的工厂布局不合理，要重新规划，把调整的意见统一起来。没有争议的可先动，有争议的要好好议论，把规划搞好。

军工要储备。生产能力转向民用，但要保留生产线，要储备原材料。原材料储备什么，这件事情要很好议一下。原材料储备多少，要合理，多了也要坏的。生产线不要再扩大了。有了现在的基础，打起仗来临时搞也可以。平时搞民品，战时开足马力生产。总后的储备也不能过多，过多了就要浪费。

小三线<sup>[3]</sup>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小三线能力不小，今后是如何提高的问题。要研究生产能力怎么搞大，要搞自动化。小三线的基础是有了，问题是如何改造，怎么发挥作用。小三线的改造问题由五机部负责。要选一些好的干部到小三线工作。五机部搞个方案，包括管理权限、质量、军民结合等。平时生产线要保留，分配一定的军品任务，好多可以转向民用。小三线有两个问题：一是搞好技术改造，二是平时搞什么。小三线工厂在一个地区，设备都比较好，比较精密，必须认真抓好，至少可以起地方工业的作用。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这很重要。

小三线的生产要合理，技术要提高，从原材料起必须保证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验收，要掌握这一条。不管有多少条意见，没有这一条不行。质量不好，一是国家不收，二是军队不用，看你怎么办！产品质量必须合格，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也不行，必须百分之百。原材料不合格就不投产，价格也必须合

理。平时要转向民用，军品也要生产一些，不然技术就要荒废了。

要研究企业的管理问题。要制定一个制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叫分工负责制。要扩大企业的权力，要给企业一定的权限，有用人的权限，可以减少人或增加人，劳动不好的淘汰，管得好的要奖励。要选好干部，要选有本事的，不能要那些搞打砸抢的，软、散、懒的也不行。要把四十岁左右的好的人提起来。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问题就根本解决不了。干部要懂行，有能力。现在拖后腿的，一是技术水平低，一是管理水平低。不单是军事工业，其他工业也有这个问题。工人、技术人员、干部都有个水平低的问题，有个不会管的问题。要好好学习，要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企业搞得很脏，就是管理不严、纪律不严，质量也不会好。军工企业首先要搞得干净，搞好清洁才能搞好管理工作。

机构改革不能搞修修补补。两万人的厂，有四分之一是干部，还有什么管理？干部多，宁可把这些人编外处理，也不要在那里占位。需要多少人，就多少人，其他的列编外。不只是军事工业有臃肿的问题，但军事工业可以先“消肿”。对搞打砸抢，搞阶级报复的，有的要受到刑事处分，不能手软。原来的主要坏头头要逮捕法办，其他的不能当干部，不能进领导班子。有些人要让他去劳动，原来是工人的，还去当工人。对这些人的处理要研究好，处理要果断。不然他们要搞破坏，军事工业受不了。

整顿企业，处理问题，要以部为主。我今天正式交待，如果有的省委有意见，就讲这是我的意见。有的人先离开领导班子，离开军事工业。整顿的问题，一九七五年就讲了，不整顿不行啊！整顿要落实，就是要落实在队伍、领导班子上。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听取第五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插话和讲话的部分要点。

〔2〕“三化”，指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

〔3〕小三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又称大三线，中部及沿海省区的腹地小三线。

## 重视现代条件下的民兵工作<sup>[1]</sup>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一日）

民兵工作的方针、政策都是老的，恢复就行。工作报告和民兵工作条例我翻阅了，都可以，就是重申一下。报告中有一句话要改一改，说“只注意生产，忽视了民兵，不注意战备”，不要这样提，民兵应该成为生产的骨干，做好本职工作，占生产的时间不要太多。民兵都是青壮年，应该成为生产的骨干、主力军。要搞好战备，就要成为生产的骨干力量。这是统一的。

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一句话，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恢复老传统。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地位。现代条件下，老的游击战还是有用的。例如民兵从地道里出来，用导弹打敌人的坦克，就是现代武器的游击动作。也可以藏在山洞里，突然出现，袭击敌人。对飞机场也可以利用黑暗或地道接近，突然行动。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 搞人民战争不是 不要军队现代化<sup>〔1〕</sup>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日）

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西方报刊说我们不要军队现代化，那是不了解情况。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就说我们要搞原子弹，这不是现代化？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我们不会去侵略人家。敌人要打进来，中国的“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现在我们民兵的武器是大量的，而且比我们解放战争时正规军的武器好得多，民兵手上就有打坦克的导弹，跟过去完全不同，但战略思想仍然是人民战争。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会见英国詹金森爵士时谈话的一部分。

## 军品引进要区分轻重缓急<sup>[1]</sup>

（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

外汇的使用原则是要集中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上，目前要用在发展钢、电、煤、石油、铁路等方面。这些方面上不去，就没有飞机、坦克。同时，使用外汇要考虑到偿付的能力。如有的部门引进后，形成生产能力，出口的产品可以赚取外汇，减少进口可以将外汇省下来，这就没有什么风险。有的部门没有偿付能力。航空工业要真正具有偿付能力，就要搞运输机出口，或者少买运输机。搞军用飞机，我们是自己用。

引进的方法可以采取多种途径。我们对于引进的项目，要慎重安排。我看还是排排队，可以排两个队：一个是非要引进来的急迫的项目，这是一张单子；有些关系虽然很大，估计引进困难的不急迫的项目，时间上可以放慢些，这是第二张单子。总之，引进的项目要排两个队，一个是项目的排队，按照轻重缓急；一个是时间的排队，分个先后次序，不要抢在这一两年。主要是引进尖端技术，像步枪那些东西暂时就不考虑了。这样，单子上这些项目大都可以排上去。

还有军民通用的问题，如风洞<sup>[2]</sup>等试验手段，计委要统盘考虑。计算机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真正把技术弄到手，有些过不了关的可以引进材料，有些元件搞不出来可以买些，我们自己来装配。这是可以走的道路，也是省的道路。我主张有些大的项目，比如军工项目，求全则拿不到，有的可以买一部分，

有的可以买部件，有的买原材料。还有的项目，只买关键材料，花少的钱，弄到好的东西。有些大项目宁可要全，比如改造三个造船厂<sup>[3]</sup>，设备、技术要引全，包括人员编制，要按人家的办法办。过去的经验，引进一元，我们要花十元，可不可以变成一比一，一比二呢？我们现在管理能力太差了。三个船厂改造后，可以形成一百万吨的年生产能力，那就了不起！造民用船，还可以出口。

电子工业要争取时间加快发展，所有部门的现代化都和它有关系，离开它寸步难行。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讨论军队引进先进技术座谈会上讲话的部分要点。这次座谈会是由邓小平主持的。

[2] 风洞，指产生人工气流，对飞机、导弹、车辆、建筑物群模型进行空气动力学试验的管道装置。

[3] 指上海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和广州造船厂。

## 军队搞好揭批 “四人帮”的五条标准<sup>〔1〕</sup>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批林彪、“四人帮”，怎样才算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

第一，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老老实实，说通俗一点，就是各级干部都要老老实实。现在有些人油腔滑调，看风使舵。批得好不好，整顿得好不好，就看传统是不是恢复起来了，是不是老老实实，而不是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要忠诚老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

第二，消除派性，彻底根除派性的影响，真正统一思想。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分裂了，派性侵入到部队，把思想搞乱了，把组织搞分裂了。派性，从干部到战士，都有这个问题。兵的风气不好是干部带出来的。连长一派，指导员一派，四川兵结成一派，湖南兵结成一派，这怎么行？

第三，转变风气。现在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印象改变了，名誉坏了。什么时候地方老百姓看军队像老八路，像老红军，这样就行了。现在有的风气不好，入不了党就动刀动枪，受点批评就不满，也动刀动枪，还有自杀的。这种风气很坏。转变风气，也包括干部。

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要贯彻条令，上下一

致，形成一个整体，纪律就从这里出来。还要加强训练。这样才能出纪律，出战斗力。

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搞清楚了，班子整顿好了，也就差不多了。部队主要还是干部，班子里的人合不合格？原来有毛病的是不是改了？要讲正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娃娃，现在可能当了连排干部，有的把打砸抢那一套带到部队来了，要很好注意教育。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点，朴实一点，但老老实实，同群众在一块，同战士在一块，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

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样搞下去吧？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只是靠运动，还要靠日常教育，靠干部的领导。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如果搞得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痛不痒，没有个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四人帮”搞学理论，以学理论代替实际工作，搞得没有味道，结果大家去打扑克，聊天。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你们几十万人，也不能一个号令，一天结束。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可以抓训练，可以组织学习科学知识。多学些科学知识，就是转到地方，也便于工作。以后就是经常性的学习，经常性的教育，不是作为运动了。作为运动搞好的标准，就是以上这五条。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 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sup>〔1〕</sup>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

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平战结合才能靠得住。

工事修好了，重点是要维护好，现在有百分之十报废了。人防工事有个配套问题，全国已经修了那么多工事，怎么才能用，得有个标准。要加固，改造，通风，要能用起来，可以住人，可以作仓库，那样维修就好办了。修了那么多工事，如不维护好，不配套，就不能用，过十年八年就坏了。宁可花点钱，也要把过去修的工事搞好，无非是防水，通风，干燥。工事一潮湿就容易垮。不通风，打起仗来有什么用？北京要结合地铁搞。地铁修通了，基本问题就解决了。质量问题很重要，宁肯慢一点，少一点，也要好一点。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听取全国人防领导小组负责人汇报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筹备情况时讲话的一部分。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会议确定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人防战备建设方针。

#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 大业提上具体日程<sup>〔1〕</sup>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去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很好，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与我们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不开的。更值得高兴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举国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开来、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

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缺乏经验，需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我们还要看到，在有些事情上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某些方面还会有困难。但是，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善于学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员对当前形势是高兴的和乐观的，也是乐意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的讲话。

〔2〕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

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双方确认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日本东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正式生效。

## 解决军队机构臃肿问题<sup>(1)</sup>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我们要足够地估计到我们这个军队是一支好军队。无论如何，林彪<sup>(2)</sup>总没有带走人吧！“四人帮”总没有带走人吧！不是讲几个人也没有，林彪带走了黄、吴、叶、李、邱<sup>(3)</sup>，“四人帮”也带走一些人，但总没有成连成连地带走吧！林彪那个时候还带走了谢富治<sup>(4)</sup>这么一个人。二野的人都知道，我对谢富治够信任的了。过去二野就有人对这点有意见，现在只好作自我批评。由此说来，看人也不容易，人是有变化的。谢富治也有个变化过程，有过去的谢富治和后来的谢富治。我们看到过去政治上很不错的人，现在变得随风倒，要找靠山，出一些坏主意，办些坏事。对这样的人，我们确实眼睛要亮。这种人就不能说是偶然犯错误，而是自觉自愿的喽！

我们这个军队，经过风浪，确实是一支好军队，但是现在也确实问题成堆。对这两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一九七五年开始提出整顿领导班子，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一次整顿，“四人帮”会带坏更多的人。当然我也不相信“四人帮”能够带走什么大的队伍，但是至少要带坏更多的人，损害更多的同志。我们又经过了这一段调整，应该说是比较好一点了，但并不是没有问题。

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真正说到底，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才是最根本的。好多官僚

主义是从这里来的。现在这种臃肿状况，使好多事情办起来不便利。一个指挥机构打麻将有五六桌人，你怎么办事呀！这是我和在座同志感到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都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倒是希望大家放“炮”，能够一个“炮”放得很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按照一九七五年确定的编制，那时顺手处理，现在还比较好办一点。那时要当顾问的，师级干部一万二千人，军级干部三千人，这一万五千人，准备养起来。现在人就不止这个数了，再过几年就不晓得多少了，地方上又容纳不下，而且我们军队名誉也搞坏了一点，也不大受欢迎。有些同志当顾问不安心。我是交心，我现在实在想当顾问。大家都知道，顾问制度是我提议的。总得找个出路呀！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则，但现在不可能。我希望一九八五年当顾问，真的，不是假的！有什么不好啊？还可以多活几年。无非是没有秘书，车子还是有坐的。要想开一点，思想不开明一点，过几年这个问题更难处理。

机构臃肿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始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十分困难，首先碰到的障碍是我们的干部。干部年轻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对。原则拥护，具体反对。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sup>[5]</sup>，讲的就是要遇到新困难。这不只是军队的问题，也是全党全国的问题。我们军队更现实。总要创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目标，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能在六年内想办法把军队臃肿状况解决了，那就会有大批老同志或者当顾问，或者退休，或者转到地方去。确实要这样做，要不然到那时，师以上干部起码有五万人要安置。这是件大事。现在要从军费拨一批钱出来修房子逐步安置，不然大家不安心。机构臃肿不堪，单单这一条就把我们冲得一干二净，再好的方针、政策也搞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提请我们在座的同志注意，就是派性始终在那里作怪。表面上看没有，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它的影子总在那晃过来晃过去。这个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军队没有的呀！这同过去那个山头主义不同。山头主义是长期自然形成的。经过延安整风，搞“五湖四海”，山头主义烟消云散。现在派性带到我们军队来了。我们有一些老同志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派性。这些年把它捡起来了，装到自己脑子里了，喜欢任人唯亲。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呀！我们部队是有传统的。传统好坏很重要。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一个部队战斗力强、作风好，打光了，补充了新兵，还是战斗力强的队伍，甚至调进一些另外部队的干部，还是保持好的作风。现在有的部队被打乱了，影响到部队的作风、团结和力量，影响到部队战斗力。一些同志有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我们确实希望有账的同志还一还好，实在暂时不愿意还的也可以拖一下，逼着不是个办法。我在政治局会上说过，我是硬着头皮“和稀泥”。看来这个“和稀泥”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是不正确的。主要的是我们处理和对待干部问题要慎重。但是该处理还得处理，特别是以后。对干部要看全面，还要看大的方面。

我们老同志谈谈心吧。我们现在责任不同。军队在全国全党政治生活中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这些老同志是管事的，不要以为不管事，不要以为随便讲点话无足轻重，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人，讲话都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分量，看到自己的责任。对问题的观察，要更加实在，处理问题也要更加慎重。对人对事都如此。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sup>[6]</sup>已经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要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会议也提出要议一议怎么转。怎

么转移？军队不是要搞什么新的章程。一九七五年的那两个讲话<sup>[7]</sup>，我看还是正确的，现在用得上的。有些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复杂、更加重了。前年底军委全体会议<sup>[8]</sup>制定的方针、方法，去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sup>[9]</sup>精神，今天看，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问题是都还没有真正扎扎实实地做。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各军兵种、各军区扎扎实实抓一下。我们所谓转移，就是按照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特别是前年底的军委全体会议、去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地做，没有别的新章程。

今天上午徐帅<sup>[10]</sup>讲了很多军队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讲了领导班子问题、教育训练问题、管理问题。这些事情要认真抓一下。主要是抓教育，抓作风，风气要正。要认真地抓训练。训练要包括我们干部转业以后能参加地方经济建设的内容。这方面的训练要很好地抓紧，确实有大批人要转到地方去。总政对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提出了五点要求<sup>[11]</sup>，那是我去年在东北讲的。有的同志说要求高了一点，高就高一点，你放低一点也可以，放低一点，能够做到就了不起。有的地方根本还没有揭批，而有的大军区说不定已经结束揭批。实际上，政策还不能说已经落实了，更多的单位还留有“尾巴”。“尾巴”有长有短，可能不短的更多一点，还有相当长的“尾巴”要好好处理，而且要加速处理，力争早点解决。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全党全国包括军队在内，处理遗留问题，粗一点也可以，要快一点转到正常状态。正常的要办的事多得很。管理问题、训练问题、政治工作问题，特别是干部问题，干部问题又有个麻烦的处理问题。

我们还要看到战争。不管哪个方面，战争准备都要加强。这方面要多考虑一下。我们说战争可以延缓一下，究竟能够延缓多久？国际局势究竟是更加缓和还是更加紧张？不是趋向缓

和的。我们同美国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sup>[12]</sup>，这可能对和平稳定有好处，能够延缓战争的爆发，但不能寄托在这上头。部队的训练要抓紧，认真地进行实战训练，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好好把兵带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三年内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就上了轨道。我们不是要把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吗？但现在并没有上轨道，要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都打过仗，那时对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都放心的呀！在座的都是带兵的人，对自己的部下都比较放心，放出去不怀疑他不能完成任务。上级对下级是信任的，下级对上级也是信任的。但是，现在这种关系被破坏了。各级要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本身就是战斗力，是重要的战斗力。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要好好把部队带一带。起码战斗部队不要臃肿。只要把战斗部队搞好，就比较放心。指挥机构里不要天天打架，你攻我一下，我攻你一下，结果大家都没有心思去管部队了。一个军区要有几个人去管部队，抓抓部队的训练、部队的管理。每个军区尽管人多，只要有几个人办这样的事，我们就比较放心。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军委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召开座谈会，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军事工作。

[2] 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3] 黄、吴、叶、李、邱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

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均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反党阴谋被粉碎后，他们被开除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十七、十七、十六年。

[4] 谢富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5] 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6] 中央工作会议，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次全会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7] 指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军队整顿的任务》（见本卷第 28 页）和七月十五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总结讲话。

[8]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

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继续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邓小平、叶剑英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

[9]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讨论并修改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等文件草案。

[10] 徐帅，指徐向前元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1] 五点要求，指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提出的军队搞好揭批“四人帮”的五条标准。见本卷第 138 页。

[12]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双方确认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日本东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正式生效。

# 如果承担不使用武力的 义务，就不利于用 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sup>〔1〕</sup>

（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

我们一直坚持一个观点：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为什么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呢？因为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就会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前几天我对记者讲，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道理很清楚，如果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蒋经国<sup>〔2〕</sup>、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那末不谈的结果怎么样？一年不谈可以，两年不谈可以，十年不谈怎么办呢？如果中国只有一只手，没有另外一只手，恐怕结果只能导致武力解决问题。如果蒋经国、台湾当局由于某些因素根本不同我们谈，甚至在我们以非常现实的态度提出处理台湾问题后，也不同我们谈，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你们从我们的《告台湾同胞书》<sup>〔3〕</sup>中可以看出，我们现在采取的步骤，是合情合理的。所谓现实的态度，就是在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以后，台湾可以同美国保持民间贸易，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人民生活条件不仅不会降低，而且可以提高。

统一台湾后，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我们真实的政策。台湾当局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只是它要把所谓的“中华民国”旗子去掉。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给他们充分的自治的权利。台湾的武装可以不解除。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也可以。以后随着中国自己的经济的发展，双方交往多了，这个问题会自然解决。我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希望你们理解，我们提出这一政策的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是这个思想。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委会特别任务小组成员时谈话的一部分。

[2] 蒋经国，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

[3] 《告台湾同胞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发出。《告台湾同胞书》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指出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和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建议台湾与大陆之间通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和两地的学术文化交流，发展相互贸易。

## 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sup>[1]</sup>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

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和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的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怎样，今后作战，空军第一。陆军、海军、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我看今后重点放在发展空军。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军用外汇的分配、使用，重点是航空工业和装备。

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不仅是航空工业。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还可以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减少一些现在生产的飞机产量，把剩余的钱用来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 调整军工生产规模，统一 装备发展方向<sup>〔1〕</sup>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

军工产品我们样样都搞不行。毛主席在世时说过，真正打起来，靠我们自己还不行，还得搞租借法案<sup>〔2〕</sup>，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从美国搞装备那样。究竟搞什么？原来爱萍同志的设想<sup>〔3〕</sup>是对的，现有装备是搞改进，也不是什么都改进，改进也不简单，也需要好多钱。要抓重点，不能太多、太宽。怎么抓法，你们要理出个东西来，不能凭主观下决心。设科技装备委员会，就是为了要综合考虑这个问题。包括二机部、七机部及其他军工部、军兵种在内，都要缩小规模。看来，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现在军队的数量也太大，首先要把规模缩小，不能太大。总的讲，规模要缩小，要求不要太多，不要项项都搞，要集中搞几项。常规武器，还是爱萍同志、王震<sup>〔4〕</sup>同志、洪学智<sup>〔5〕</sup>同志一起参加研究。

科技装备委员会要把计划数字缩小，抓紧必须搞的几件事，要快搞，不然尾巴很长。陈云<sup>〔6〕</sup>同志提出调整国民经济，包括调整引进规模。三年调整时期，陈云同志提出要退够，意见很对。现在军工企业也有个退够的问题。科技装备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统一军队装备发展方向。计划工作还是科装委发挥作用，做出的计划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再提上来。

引进问题，总的矛盾是要办的事太大、太多，要求太高。要精选几件必须办的事，先抓起来。各部不能齐头并进，不能各部都搞，不要统统都上，要抓急切的三五件事，抓多了什么都没做成，结果更慢。我们需要的东西多得很，有些待富起来以后再搞。按原来的要求不行，国家的财力办不到。过去的计划，办不到的可以不算数。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汇报时讲话的部分。

[2]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谈话时说：“打起来了，搞租借法案那也好嘛。”租借法案，指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将任何物资租借或供给任何国家，只要认为该国的防御对美国的安全有利。据此，美国向国外共提供了五百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百分之三十二提供给苏联。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停止提供。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主任张爱萍提出的装备发展分几步走的设想。该设想提出，八十年代前期主要是现有装备的改进，齐装配套，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搞出自己新的装备。

[4]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

[5] 洪学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6]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 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sup>[1]</sup>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sup>[2]</sup>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sup>[3]</sup>，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最早是林彪<sup>[4]</sup>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

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接班的问题。

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我们把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处理了，好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军队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

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sup>[5]</sup>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怎样解决等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现在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

干起来了。我经常讲，进军西南的时候，地方干部少，有排长当县委书记的，有连指导员当县委书记的，也有营团干部当县委书记的。那些连排干部（当然都是挑选好的）经过几年锻炼，和营团干部一样胜任，都是很好的县委书记。

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2] “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3] 指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 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5]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海军建设要讲真正的战斗力<sup>[1]</sup>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建国初期海军就建立了<sup>[2]</sup>，开始一段不错。自从林彪<sup>[3]</sup>把李作鹏<sup>[4]</sup>弄到海军，带来灾难。以后是打派仗，打派仗当然不只是海军。总之是多灾多难。

前几年，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要把海军搞好。海军就这么一点，要搞大一点，要加强，要有一点力量才行。海军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不理想。去年，我就出现的问题对你们海军“将了一军”。因为在这以前，空军提出搞三查<sup>[5]</sup>，其中就包括质量大检查。既然空军搞了，海军也应该搞。海军并不是太太平平，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很顺当，同空军过去一样，也是问题成堆。但只要抓得好，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据了解，你们舰艇的在航率不高，你们如果抓得好，起码可以解决相当问题。这次对越自卫还击战<sup>[6]</sup>，南海舰队抓了一下，一个月就抢修了八艘潜艇。所以就看你抓不抓，抓得认真不认真。当然也有同地方协作的问题，主要是靠自己的修理厂。抓不抓不一样，抓得紧不紧也不一样。不仅海军的同志，大家都要吸取这个经验。这一抓就大见成效，这个成绩不简单。那时候空军大检查发现了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并不是说空军工作十分完满了，而是说他们有行动。大检查，海军知道，陆军也知道，就可以拿这面镜子照一照。那时我们海军的同志，天天只要多少吨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

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每一艘战斗舰艇包括辅助舰艇都要顶用。你们也要有一个章程，起码百分之八十顶用吧。不从这方面着手，国家浪费，而且把风气搞坏了。舰艇的在航率那么低，这个作风就很不好，讲作风首先是讲这个。南海舰队抢修潜艇的事例说明，并不是没有能力搞好，是有能力的。当然有的修不起来要报废，有些可以修起来，以此类推，其他舰艇也是一样。像核潜艇那么现代化的东西，出不得事故。工作不扎实，这不是下面的问题，恐怕是领导有一种差不多的思想。

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当然，实现现代化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现有的东西要搞好，起码要好好修理一下。有些舰艇要配套。有的潜艇我是没有看过，听说很漂亮。只看表面不行，要看实战能力。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的一部分。

[2]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成立，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委对海军关于海军成立日期问题的请示的批复：“同意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的日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3] 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4] 李作鹏，一九六二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

因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三年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5} 三查，指空军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进行的查斗志、查纪律、查工作学习活动。

{6} 对越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

# 为海军题词<sup>〔1〕</sup>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

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邓小平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

## 注 释

〔1〕 这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邓小平在山东烟台乘坐导弹驱逐舰出海视察时为海军的题词。

# 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sup>[1]</sup>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

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sup>[2]</sup>，还有伊朗问题<sup>[3]</sup>，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sup>[4]</sup>、中东问题<sup>[5]</sup>。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

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

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

今天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进入八十年代十六天了。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

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部分内容。

[2] 阿富汗事件，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下旬开始的苏联军队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入侵。

[3] 伊朗问题，指一九七九年十月美国同意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去美，伊朗学生于同年十一月扣押美国驻伊朗使馆人员作人质，要求美国将巴列维送回伊朗受审和归还伊朗在美资产而引起的伊美关系危机。

[4] 越南问题，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越南当局的反华、排华和对民主柬埔寨的大规模军事侵略。

[5] 中东问题，指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所引起的中东复杂的矛盾，以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这个战略要地的角逐。

# 赞成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月)

—

请耿飏<sup>[1]</sup>同志负责，召集有关部门的同志认真议一下，再作决定。我是赞成这样办的。合并之后，完全企业化，铁道兵人数也可大减。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七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领导同志建议铁道兵与铁道部工程局合并的报告上的批示)

二

合并后，人员要大大减少。因此，不要规定保留原有师局数额。

(一九八〇年二月四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

注 释

[1] 耿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

## 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sup>〔1〕</sup>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二日）

军队的问题，最近我和一些同志谈过，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是“消肿”，第二是改革体制，第三是训练，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第一，讲“消肿”。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我讲的不是像对越自卫还击战<sup>〔2〕</sup>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好应付。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有好多干部没有打过仗，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装备又比较落后，等等。但是经过对越作战可以看出，勇敢这两个字我们还是有的。军队勇敢，这很好。仗打起来，开始可能吃些亏，经过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变化，有勇敢这一条，我们就能学会打仗。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这件事在一九七五年我们就提出过，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这几年，军队的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了起来。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

时间。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这次的措施比一九七五年更进了一步。比如，各级指挥员人数，过去保留得多一点，这次要力求少一点。很多同志提议，一个团两个副团长、一个副政委就可以了，这个意见好。师也可以这样做嘛！现在领导班子实在太大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果断处理，再过几年，不晓得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子！请大家对比一下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情况。一九七五年时，军队要包起来的干部已经相当多了，现在，相隔四年之后，要养起来、要退休的人就更多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下决心解决，再过几年，问题会更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困难。所以不下这个决心不行了。特别还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军区一级、军一级、师一级干部，年龄大体差不多，都相当大了。过几年，统统老了，不但不能到军、师工作，到军区、总部工作也不好办。这是自然规律。在座的同志再过五年怎么样？恐怕到那时不说所有的人，就说大部分人，要坚持工作也困难了。再过七年八年，都七十岁出头了，你还能在战场上见分晓啊？真正打起仗来，三天三夜不睡觉行不行啊？所以，现在的“消肿”也有利于我们干部的更新。我们下面的干部之所以上不来，就是因为上面盖住了。这

不只是军队，地方也一样。今天，主要的岗位还只能由老同志来搞，再过几年总不行了嘛！所以，这次精简要把盖子揭一层，包括团级的、营级的、连级的都要揭，为提拔新生力量创造一个条件。

对减下来的干部，我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地方上没有房子，可以利用军队的营房，教员请地方出。这些干部往哪里安置，可以同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商量。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又比如，我们现在缺乏教员，可以安排一批军队转业干部去教书。当然，转业干部中能当大学教员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但是，能当中学、小学教员的还有的是。要说服这些同志去当教员。大家提到，大专学校设军体教员，这方面名额有限。全国大专学校只有几百所，每所学校假定平均用十个人，顶多能容纳几千人、万把人。但对中小学教员的需要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培训一批合格的教员，地方上可以容纳。还有，各行各业缺乏管理人员，只要经过训练，条件相宜，也可以安排一批。军队干部指挥部，也是管理，总有管理知识嘛。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各行各业都愿意接纳军队的人呢？因为军队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比较高，还有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军队转业干部中会管企业的人不多，但是总有管理军队的经验嘛！问题就是需要培训，

转到哪一行就学哪一行。训练时间，有的半年，有的一年，有的一年半。经过训练，再转到地方，地方就比较容易安置。过去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无非去当政治部主任，搞政治工作或一般工作。现在这些人不缺，还有多余的。所以，要根据地方需要，按专业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等培训干部，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排问题。

第二，讲改革体制。

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比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

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五十年代搞了个军官服役条例，一直没有行通，后来放下了。其实那个条例基本上是个好设想、好办法。如果那个东西执行了，就不会有现在的困难。这次会议后，就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国务院也要办这件事。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当然规定要切实可行。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否则一个人一个人地处理问题，处理不下去。军队老同志退休，办法是军队把房子盖好，再转给地方。现在只能这样做，因为地方一下子接管还很难。还有，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军事院校的好多教员，也可以用文职人员，不一定用军人。教

数理化的为什么一定要军人呢？该当教授就当教授，该当讲师就当讲师。军队医院也可以实行医务人员的制度，定技术职称，搞那么多行政职务干什么？这些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

这次精简，有了一个编制方案。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编制、体制。有些同志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很值得我们思考。比如，有的同志提出，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

### 第三，讲训练。

一九七五年我们就提出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这一段时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现在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当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有知识，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排连干部要初级步兵学校毕业。毕业后，一般的当排长，好的当连长。营团干部要进过中级军官学校。从排长、连长里选好的来学，经过一定时间学习才去当营长、团长。军和师的领导干部也要进过高级军官学校的才能当。这个要制度化。我

们现在有条件这样做。过去是在战争中训练，从战争中学习，而且那个学习是最过硬的。但是现在，即使有战争，不经过学校学习也不行，因为装备不同了，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连地图都不认识，那怎么行啊！现在还不是会不会识图的问题，那个还容易解决。现代化战争非常复杂，连通信联络都不容易。一个连作战，配属你几辆坦克、几门火炮，你怎么指挥？你连长没有这个知识是不行的呀！所以非学习不行。军官的晋升也要制度化。每个阶段的晋升都必须经过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的知识。特种兵也应该如此。徐向前<sup>[3]</sup>同志每次都讲要多办学校，这个意见很好、很对。宁肯少几个兵，少几个机关人员，也要把学校办好，让多一点人进学校。

平时部队的训练，大家也还是在抓，确实也需要抓紧。但是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刚才我说要编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

最后，讲一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同志们在发言中也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有人反映现在兵难带，特别是城市兵难带。城市里有的把一些不大守规矩的青年往军队里塞，这个问题以后征兵的时候要注意。但是，不管怎么样，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削弱，政治工作人员不懂得做政治思想工作。其实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所有的军事人员、政治人员都要做。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

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一个学校都如此，我们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从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对越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

[3] 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 对军队精简整编工作的意见<sup>〔1〕</sup>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九日）

对整编方案，应该坚持下去，不坚持下去解决不了问题。

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应该大量精简，不能照顾情绪。铁道兵人数要减一半。工程兵要减一大半，留十万人就行了。都不叫什么兵种，取消兵种，合拢来叫工程部队，实行企业化。人少了就有事情干了，就好实行企业化。工程部队可以撤销师的机构，实行四四制，不要实行三三制。军事工程施工，由他们负责技术指导，施工主要由步兵搞，这样既省钱，又锻炼了部队。构筑工事本身就是训练部队。这个意思，你们如果同意，搞一个文件发下去，坚决执行，谁不执行就把谁调开，头头不执行就把头头调开。

军队干部的安置，除转业、退休的干部以外，离休干部的住房，还是由军队管起来，由军队出钱，修建好以后，再统一交地方政府管理。离休干部长期由军队供养管理是不行的。

我在内参上看到，一个团长在笔记本上记了许多军事知识和各国的军事情况，这说明部队是有人才的。这样的干部眼光开阔，有远见，可以送学校培养一下，提起来。我叫中组部派人下去选拔年轻干部，但光中组部不行，大家要一起来做。三总部都要派人到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选拔年轻优秀的师团干部。要选有文化、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四十岁左右的干部，不要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选来后送军事学

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学习。学习内容要广泛一些，知识面要宽一些。通过学习、作业和训练使他们得到培养和提高。现在选干部总是在六十岁左右的人中间打圈圈，提起来也干不了多少年了。要把年轻优秀的干部提起来，这样的人可以再干二三十年。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也可以下去选，用两个月、三个月或更长一点的时间，由总政牵头，选一百个对象，每个人都搞个卡片，送主席、副主席各一份。

国防工办肯定要撤销，不要考虑与国防科委合并问题。国务院也要精简，五十多个部，有的要合并，有的要撤销。部的机构人不要多，下面可以设公司，按系统管理，可以打破省的界限。再搞一个机械制造工业部，下边也设一些公司，如汽车公司、发动机公司等等。军队可以向这些工业部门提出武器生产项目和要求，把科研经费交给他们，由他们研制，研制出新产品，合乎要求的军队就订货。军队和这些部、公司就是个订货关系。有些武器装备，这个部可以制造，别的部也可以制造。哪个部产品好，军队就买哪个部的，他们可以互相竞赛。这样，以民为主还是以军为主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只存在订货关系。

军队生产还是不搞为好。目前军队不生产，粮食就不够，可以过渡一下，三年以后改成养猪种菜。不然像现在这样长期搞生产，会把部队思想都搞坏了。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共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领导同志汇报军队精简整编工作情况时讲话的一部分。

##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sup>[1]</sup>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一旦有事，还是我们的老话，立足于自己。立足于自己就要有信心。人家是优势装备，我们是劣势装备，新式一点的好一点的装备，不可能搞得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搞。所以，要是打仗还只能立足于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立足于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这个基础上。武器装备，比现在稍好一点是可能的，好得太多一下办不到，没有钱。对这一点，大家心中要有数。买先进的作战飞机，你能买几架？买几架就买穷了。我们有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装备的传统，要相信有这个本领。

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中国的特点是不信邪，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sup>[2]</sup>就表示了我們不信邪，老虎屁股可以摸一下。当时世界上一片怕声，怕得要命，但我们表示不怕。我们中国有几个特点，一个不信邪，一个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算起，从井冈山算起嘛，当然不只是井冈山了，到解放战争结束是二十二年，加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五年。就拿抗日战争本身说也是八年，如果抗日战争加解放战争是十一年多。所以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还有劣势装备战

胜优势装备的传统。过去我们什么时候是以相等的装备战胜敌人？都是很劣势很劣势的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现代化装备不是没有缺点的，两只脚当然跑不过摩托车，跑不过坦克，但是两只脚方便得很，只要有点小米就行了，坦克、飞机也要“粮食”，一旦卡断了，就不行了。淮海战役时，黄维兵团<sup>[3]</sup>是机械化装备，坦克也不少哇，最后断了补给，坦克当作工事，周围一圈都是坦克，根本不顶用。这个很多同志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有劣势装备战胜强大装备的传统。这一点要强调。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有信心、增强信心的根据。我们总是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

有的同志提出要研究我们军队的组成问题。究竟将来战争打起来，军队组织以什么形式便利？基本上是我们现在这样，还是有些还要改的？比如有的同志提出，过去我们也设想过，把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战时这就是预备队，使用于突击方向。这样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今天我不是作结论，是提出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有的地区，首先搞一两个合成军。现在普遍搞不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练兵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化作战的知识，我们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像这样的问题，军队的组成问题，或者部分组成问题，要提到我们日程上研究。我想，同志们提出这些意见对我们有启发。平时的组成要同战时结合，比如说，根据我们这次讨论，制订出动员的方案。现在我们军队缩减了，但还是多了，平时很不合算，不需要这么多。如果把动员方案制订好，战时

指定哪些地方补充，那时打仗的人不一定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三十几岁也可以嘛，这就可以减少平时军队兵员数量。世界各国军队用到人头上的钱并不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干部多了，机关太大了，打仗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军队的一种病态，很不好，人越多越不好办事。过去我们都打过仗嘛，那时指挥机构多大？有几个人？还不是一样指挥嘛！非常便利。现在不得了。精简方案，第一步定下来，以后还可以再减少一些，真正把钱用来搞装备。精简下来的干部要安排好，这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必须做。

再一件事，就是抓训练。这件事可不能放松。训练可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练。当然，合成军是这样，其他的也应给它这个条件，给它坦克，给它炮，给它其他装备，进行训练。不但学校注意训练，部队也要注意实战训练。政治工作要保证加强胜利信心，就是劣势装备战胜先进装备，持久战，要注意这一方面的教育，这也是个训练问题。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举办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

[3]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该兵团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徽宿县西南双堆集附近，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黄维被俘。

## 搞国防建设要精打细算<sup>〔1〕</sup>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现在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百五十多美元，在世界上名列一百位以下，是穷国。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就进入小康社会。这要求我们的军费维持现在的比例。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响经济建设。所以对我们军队的同志、在座的同志来说，就是怎么把这个钱用好，把钱更多地用来改进我们的装备。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现在我们人头费花得多。一九七五年，我们曾决心“消肿”，每年节省一些钱用来搞装备，但是没有实现。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的问題，而是在这个已定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一句话，就是国家预算里边的军费比例现在不能增加了，军队本身的任務就是把钱花得好。怎么花是个学问，要好好研究，精打细算，方针要对头，办法要对头。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举办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sup>[1]</sup>

(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

我们希望里根<sup>[2]</sup>先生就任总统后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sup>[3]</sup>先生、基辛格<sup>[4]</sup>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在卡特<sup>[5]</sup>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sup>[6]</sup>。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sup>[7]</sup>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我们请布什先生向里根先生转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很清楚的立场。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

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今后我们派代表团要控制一下，当然不是说正常的来往不需要发展。最近我们正在进行经济调整。我们敢于公布财政赤字，表明我们还有某种自信。通过调整，今年我们的财政收支可以基本达到平衡。日本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相信信用控制的方法能够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我们可以办到，而且我们还进一步确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

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最近荷兰发生了一件事，说是荷兰的公司搞的，准备同台湾签订合同，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荷兰政府当然干预了这件事。其实荷兰政府搞这笔交易是得到某些人支持的。我们正在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当然，我们还做一点工作，希望荷兰改变它的立场，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议会是以微弱多数通过这个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笔交易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做了工作以后不行，那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

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谈话的一部分。

[2] 里根，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任美国总统。

[3] 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任美国总统。

[4] 基辛格，当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会谈。

[5] 卡特，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任美国总统。

[6]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

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力量”。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7] 布什，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任美国副总统。一九八〇年八月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份访问中国。

# 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sup>[1]</sup>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日）

北京、沈阳两个军区，先各搞一个集团军<sup>[2]</sup>试点，尔后根据条件逐步再增加。当前搞多了，单是营房就解决不了。北京、沈阳各搞一个军，平时进行训练，或组织合成训练也比较好，对干部锻炼大有好处。

至于总部体制和兵种体制是否改革，请你们再好好研究一下，可以各提出两三个方案，提交到一定的会议上让大家讨论。这些兵种和个别大单位，至少今年不要再大变，要稳定下来，暂时不变动为好。看一看再说。

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军队还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即便大战马上打起来，我们也来得及。说老实话，我军的装备在近几年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我军人还是这些人，武器也还是这些武器，打就打，又有什么可怕的！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同志汇报军队精简整编情况

时谈话的一部分。

[2] 集团军，军队的一级组织，下辖若干个军或师。从一九八五年起，为适应现代作战的需要，增强合成作战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将陆军军改编为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 搞实兵演习，提高部队实战水平<sup>〔1〕</sup>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以前只在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sup>〔2〕</sup>，我去看了。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要搞一次。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通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人民看，这样加强了军民关系，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就按第一方案<sup>〔3〕</sup>搞一次，节约一点。总参具体抓。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是看组织能力怎么样。演习时各军区、各军兵种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同志关于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情况汇报时的谈话。谈话后，他在演习方案的报告上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2〕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举行的抗登陆实兵战役演习。演习由训练总监部组织领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任总导演，参加演习的有陆军、海军和空军共六万余人。通过这次演习，丰富了解放军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军队高级干部组织与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并取得了组织较大规模的战役演习的经验。

〔3〕第一方案，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拟的十万多人参加的演习方案。

#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sup>[1]</sup>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当前还是以贯彻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要以中央四位常委<sup>[2]</sup>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等文件为准进行工作。

第二，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sup>[3]</sup>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黄克诚<sup>[4]</sup>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第三，我们总是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sup>[5]</sup>，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大跃进<sup>[6]</sup>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sup>[7]</sup>，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

第四，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

关于“三支两军”<sup>[8]</sup>问题，你们研究一下。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军队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抓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干部的思想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只要做了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情况就会起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做工作，多进行教育。

第五，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

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第六，陈云<sup>[9]</sup>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然后要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

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第七，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这方面已有成效，要继续抓好。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

怕”<sup>[10]</sup>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

第八，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的谈话要点。

[2] 中央四位常委，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3] “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4]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5]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指这一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6] 大跃进，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这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7] 两次郑州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根据

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8]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9]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0]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 减少军队员额服从经济建设<sup>〔1〕</sup>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

后勤部跟司令部、政治部一样，应各有一个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同级党委常委，以利工作。至于是部长还是政委，谁参加合适可由他们定。像军委办公会议一样，三总部各有两位同志参加。至于后勤的职能和工作关系等问题，还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一九五二年批准的文件<sup>〔2〕</sup>精神执行。当然现在情况有变化，你们可以起草个文件，以一九五二年那个文件为基础，并根据新的情况，写明职能、工作关系，各级后勤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同级党委常委，以及后勤实行同级军政首长和上级后勤的双重领导，后勤与司、政机关的关系，等等，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要在过去那个文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规定，发下去执行。

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要调查研究，提出方案，今年是来不及了，先稳定一下。如果能减下来，就能用节省的钱多搞点装备。

干部问题要清理一下。如顾问聘任、干部离休、干部转业、家属子女就业等问题，一是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能伤感情；二是要搞个制度。做政治思想工作也要有制度。随军家属子女问题，实际也是个干部问题。一个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干部及其家属的问题。这都是大事，

要广泛讨论，都要理出个头绪来，搞个方案和制度，多征求些意见，多商量，定下来以后，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实施。

装备修理，关键靠搞好平时的维修保养。当然像南海舰队为战备搞突击抢修也可以，但这不是主要办法。仓库保管员要专业化，不仅是仓库保管员，还有飞机修理人员、舰船修理人员、医务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都应该搞成辈子兵。这个问题我讲了很久了，从一九七五年讲起，六年罗。辈子兵可以按干部待遇，可以升级。这样可以保留骨干，也可以减少人员。部队减人，听说把后勤技术人员减了不少，这就不好了。各种技术人员都要计算一下，要有计划地进行培训。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领导同志汇报军队后勤工作时的谈话。

[2] 指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的全军后勤部部长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全军后勤组织原则与领导关系的决定（草案）》。

## 改革军队的干部制度<sup>[1]</sup>

（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

五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要逐步实现，一下子不行。我讲过要搞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很迫切，因为事情总要做嘛。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sup>[2]</sup>上，陈云<sup>[3]</sup>同志提出要着重选拔四十岁以下的领导干部，这就更难了。但难也要做。军队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好办些。比如战略问题，已经有了个设想，我看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对老干部的安置，军队和地方曾采取了很多办法，但我想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搞离休、退休制度。顾问要少，堆的人多了不得了，庙也腾不出来。要先解决一进二出。所谓进，就是为年轻人上来创造条件，不要搞论资排辈。离休和退休制度，着重搞退休制度，不能都堆在军队里。真的打起仗来，超过四十岁的人就跑不动了。对离休、退休干部的安置，下决心把条件搞优越些，多花几个钱。这笔钱可以另外拿，一定要把退下来的干部安置好。要搞出个规划，比如建哪些点，盖多少房子，等等。人员的安置，完全集中或者完全分散都不行，都集中到大城市里来也不行。大城市建筑房屋地皮贵，可以请国务院考虑下道命令，用征购的办法解决。

干部定员也要有个制度规定，人数多了总不是办法。过去，三野的司令、政委就是陈毅同志一个人，二野一个司令、

一个政委。现在，各级的副职太多。我看大军区一级有两个副职就够了，还有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嘛。军一级最多有两个副职就够了。总部的副总长、副主任也不要这么多嘛。

军委办公会议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办法，三总部要在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总参就是总司令部，今后军事命令应该由总长下，有的命令应该由总政主任、总后部长下。这涉及一个制度问题，要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五年能否理出个头绪来？五年作为过渡期，五年后可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常委制度也应该考虑。过去军委常委人数不多，平时也不开什么会。现在军委常委成了一级，这个制度是“文革”后期搞起来的。那时，张春桥、王洪文<sup>[4]</sup>非常强调常委的权力，他们再忙也要到会。林彪<sup>[5]</sup>管军委的时候，还指定一个副秘书长当联络员，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军委常委作为一级，人数多，很不灵便，什么事也办不通。

要首先解决好军委直属系统、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问题。我还是那个想法，军种要保留，有些兵种应该撤销，太多了不好。要议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后，把这支军队建成什么样子，五年后又怎么办。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谈话的部分要点。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2] 指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至四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陈云在会上作了《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4] 张春桥，“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林彪，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sup>[1]</sup>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前些时候我同胡耀邦<sup>[2]</sup>同志说了，要找宣传部门谈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sup>[3]</sup>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

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sup>[4]</sup>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

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状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近几年出现很多青年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这是好现象。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

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我刚才提出的需要进行批评的作品、观点，只是一些例子，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文章，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不一一列举了。《苦恋》和那个青年诗人的讲话，为什么还有那么一些人支持？这值得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同志深思。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的思想界比较清醒了一些，再加上对非法组织、非法刊物采取了坚决取缔的措施，所以情况有了好转。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要保持警惕。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sup>[5]</sup>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

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总之，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努力工

作，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要点。

[2] 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一九八二年九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七年一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了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会议同意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3] 党的三大作风，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4]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指这一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5] 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八〇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正规化的革命军队<sup>〔1〕</sup>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演习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你们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

当前，我国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有力贯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更加安定团结，各条战线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国际上，反霸斗争更加发展，霸权主义更加孤立。但必须看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sup>〔2〕</sup>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的讲话。

〔2〕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 听取全军政治工作汇报 时的谈话要点<sup>[1]</sup>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一、关于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sup>[2]</sup>的问题。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每年开一次好。你们这次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的方针和四项任务，我同意。

陈云<sup>[3]</sup>同志提出过要学哲学。你们在政治学院<sup>[4]</sup>举办高级干部读书班，学《决议》<sup>[5]</sup>，学哲学，很必要，很好。

我和外宾谈话时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有理想，讲道德，遵守纪律，还要有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看来主要的是这一些。

## 二、关于军队调整方针的问题。

从全军来说，三年工作中心是调整，把军队搞精干。政治工作能够保证把调整搞好，就不错了。不精干，矛盾解决不了，事情做不通。这个问题，涉及许多老同志，要慎重，要周到，更要坚决。地方上也是这样，原来不坚决，现在要坚决了。政治工作做好这一件事，就了不起了，可繁重啦！当然，调整不仅是政治工作、政治机关的事。调整不只是明年，还有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最费精力的就是调整，要花三年的时间，把这件事做好。军队和地方要安置的干部，大约有一百万。

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和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

军队还是要搞定额。总参副总参谋长几个，总政副主任几个，要有个定额。这里面也有个年龄问题。大军区首先也要有个定额，副职都不超过三个，副司令不超过三个，副政委不超过两个到三个，副参谋长有个把就够了。要调整，定额一定不能推翻。一九七五年提出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有让步，要留一点后备力量。那时提的精简整编，没有贯彻下去。这次，军以上，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都要搞得干净利落一些，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规定了定额以后，就有个一进一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出的问题，是离休、退休的问题。现在，离休、退休条例已经批准了。出的问题，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安置好。你们提出，五十多岁的师的干部要离休、退休。但是他们不少人还能工作，可以考虑那些身体好的，有的经过训练可以当法官，当警官，政法战线上要多安排一些干部，有的可以留下到学校学习。当然也要有个限度，不是都能这样做。

调整不只是减人的问题，还有一个进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选什么人进班子接替的问题。人一定要选好。第一是政治上要好，第二是比较年轻。坚决走这条路，不然以后又要重搞。所以，选什么人很重要。现在还要加一条，叫作不能搞派性。过去叫作宗派、山头，或者说是任人唯亲、搞小圈子。这种人不能进班子。

三、关于稳定师以下作战部队各级干部的问题。

看来，稳定师以下干部比较好，包括师。因为师的干部新提的比较多，年龄不算很大，稳定一下好。师以下，主要是讲

作战部队的师以下。要把师以下作战部队的各级干部稳定三年，三年以后再看。当然，个别的调整是会有有的，但不要大动。

#### 四、关于军队院校办校方针的问题。

你们在给政治学院的指示中提出的“全军办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教学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是对的。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过，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教育训练，就包括院校。

#### 五、关于战士提干的问题。

过去在战争时期，也很注意经过教导队学习，再提拔干部。战争时期，还很讲究经过战争的考验。现在是要经过院校的学习，也包括教导队学习，才能提干。世界上各个国家军队，差不多士官都经过士官学校学习。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先当士官，以后再当军官。战士考学校，考教导队，文化达不到的，可以给他一些补习时间。

#### 六、关于军、政、文教育训练时间比例的问题。

政治学院高干读书班的同志反映的军、政、文比例问题，还是按“六、三、一”不变好，可以不改了。扎扎实实地搞，军事训练有“六”就够了。思想工作要好好抓，“二”不够。文化教育还要继续搞，军队要学习科学文化。以后军队质量要提高，知识水平要提高。所有转业的，都要经过训练。干部学文化，也是为转业创造条件。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汇报全军政治工作时的谈话要点。

[2]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全军继续抓好深入学习和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部队各项建设，进一步提高战斗力。会议决定在全军普遍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连队、先进个人的群众性活动。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4] 政治学院，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一九八五年与军事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5] 《决议》，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 军队要在植树造林中多做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九八三年一月)

一

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对全军绿化工作提出的意见)

二

空军要参加支援农业、林业建设的专业飞行任务，至少要搞二十年，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关于空军支援农业、林业的指示)

三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的题词)

## 四

兰州部队要下决心拿出二十年时间，协助地方搞好西北高原的绿化工作，改变西北自然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兰州部队绿化工作提出的意见）

#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军队的问题，这次会上谈得不错。这些问题的处理，我都赞成。虽然有些问题处理得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现在也只能这样。

体制改革的问题，杨尚昆<sup>[1]</sup>同志已经讲了，我不想多讲了。只讲一点，就是体制改革要提到怎样一个高度来看。最近我有两次讲话，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当然还有“五讲四美”<sup>[2]</sup>，军队叫“四有、三讲、两不怕”<sup>[3]</sup>。精神都一样，都是对的。军队有军队的特点。我跟理论界同志谈了为什么要强调守纪律。他们赞成提这个要求。没有纪律可不行啦。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所谓四个保证，就是指这四件事情。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比如为什么要提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因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

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已经不少，经济犯罪很严重，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总之，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机构改革，我们走了第一步，开了个头。党政先行了一点，军队后了一点。总的来说，搞得比较顺利。军队经过这个会议，在座的同志思想认识一致了，大家都同意了，这就好办了。现在看，可能第一步目标的完成，军队还会快一些。因为军队的特点是，一行动起来就快。当前，所有党政军机构改革，都叫做第一步。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人承担，都要明确。国务院合并这么多部，如果照老的方法可不行啦！副总理减到两个，这就要随着机构改革，加强部委的工作，加强部委处理问题的责任和能力，部里要加强司局的责任和工作能力。相应地，也要加强厂矿企业、一些公司的责任。不改革，不行。

军队也有这个问题。将来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怎么简化，现在还不成熟。军队目前的体制、领导方法、

制度，不是那么好的，很繁琐。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然后几个总部。真正来说，就是加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的工作责任，上面有一个小的协调机构就行了。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过去打仗的时候，负领导责任的，一个野战军几个人，一个兵团几个人，一个军几个人，一个师几个人，有的师还是师长兼政委，有个把副政委，搞得蛮好。一野、三野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一个人，彭老总、陈老总，其他野战军都是两个，方便得很嘛！现在是一大堆人。机构改革，算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做的。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宁肯慢一点。这次机构改革，军队是后了一步，但也有必要，酝酿得更成熟些，大家思想更一致，更容易解决问题。

尚昆同志讲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点内容。我今天着重讲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也有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我看在座的，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了吧？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选拔一些政治上好又比较年轻的干部，把他们一步步地提升上来。发现人才，可不容易呀。我们一般老同志，脑筋里的框子还是局限在我们同等年龄的人，一谈干部问题，都还是这个圈圈里的。拿我们军队来说，“三八式”上来都不容易。军队确实有一个传统的习惯，还有“老上司”这些问题在里面。一大堆老红军压在上

面，其中包括我在内。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聂荣臻<sup>[4]</sup>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从全军来说，现在团以下干部还比较年轻，师以上就不年轻了。这次办公会议准备了一个《军官服役条例》，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必须搞，不搞不行。

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前年，我同陈丕显<sup>[5]</sup>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sup>[6]</sup>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我们军队有这个问题。尚昆同志讲了，有的团的干部、有的营连干部，那种思想状态、政治观点是不好的，应该看得清楚。相应地，好的也应该鉴别出来。我曾经建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现在还请各路“诸侯”，每一位选十个人，搞出一个名单。光在座的六十几个人，就可以提出近千把人的名单。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总之，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

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我们有好多事情就是做得比较晚，现在耽误不得。关于体制改革问题，我就讲这点意见。

#### 注 释

[1] 杨尚昆，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

[2]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3]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4]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5]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6]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一年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活动。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 为《星火燎原》题词<sup>〔1〕</sup>

（一九八二年七月）

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邓 小 平  
纪念建军五十五周年  
为“星火燎原”题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为战士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历史回忆录《星火燎原》的题词，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解放军报》。《星火燎原》是记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辉历程的大型革命回忆录选集。一九五六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得到包括党、国家和军队一些领导人在内的军内外广大干部的积极响应。从一九五七年起，《星火燎原》陆续结集发表了大量征文。一九七七年，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星火燎原》选编修订和出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共出版十集。

# 中国的对外政策<sup>[1]</sup>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国际上许多朋友都信任我们。我们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也是理解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关系决定的。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我们历来不大相信裁军谈判会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是赞成谈判的。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

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世界上有人怀疑一旦现在中国这些领导人不在了，中国的政策是不是会变。我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变，变不了！如果中国想自己发展起来就需要这样做，谁也变不了。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不错，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符合我们这个宏伟目标的，尽管这个目标人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仍然称之为宏伟目标。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sup>[1]</sup>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对香港问题<sup>[2]</sup>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sup>[3]</sup>。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sup>[4]</sup>！我们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

的时间了。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

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

[2]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

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奋斗。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一九九七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在同她会见时作了重要谈话。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一九八三年三月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四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一九九七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面。十月英国首相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一九九七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

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驻部队，负责其防务。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由当地人组成，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在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属于中央政府；英方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一九九七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变，等等。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

从一九八四年四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

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问题是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问题之一。中方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其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一九九七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一九八四年四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华，邓小平会见他时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办？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七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一九九七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进驻香港，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撤销。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点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的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提法，先后提出的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的含意，中方坚决不能接受。最后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

式，采用以下表述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解决了主权归属问题的表述。

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讨论了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进行了反复磋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九月二十六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3]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为一千零七十六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面积七十九点七七平方公里，九龙面积十一.七平方公里，新界面积九百八十四点五三平方公里。据一九九二年底统计，香港总人口为五百九十万。香港地区在英国占领之前，隶属中国广东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今深圳市）管辖。

[4] 李鸿章，一八七〇年起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代表清朝政府主持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 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 是我们的长期战略<sup>[1]</sup>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国同东盟各国搞好关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是我们的长期战略，因为超级大国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威胁还没有消除，而且在继续增长。苏联的军事力量还在增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一些做法也不得人心，亚洲不少国家对日本也有忧虑。教科书问题<sup>[2]</sup>你们也有反应，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很大，但它不是孤立的。前些年有个三岛由纪夫事件<sup>[3]</sup>，这是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战后这种思潮在日本一直存在，它不仅是现在一代人的问题，还将影响后代人。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就不能只是现在一代，而且还要包括后代。用这种教科书精神教育后代行吗？在日本有“台湾帮”，是一大势力，还要建立“满洲国”<sup>[4]</sup>纪念碑。纪念这样的侵略行径干什么？我们不但现在，以后也坚持同亚太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对付超级大国的挑战。亚太国家主要是加强合作。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时谈话的一部分。

[2] 一九八二年春，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篡改了日本军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把“侵略华北”改成“进入华北”，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甚至把“南京大屠杀”的起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等等，为军国主义开脱罪责。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希望日本政府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日本政府表示，要充分倾听中方对教科书表述的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作为过渡措施，将用文部大臣发表见解的办法，指导教师在讲课中贯彻政府的认识。

[3] 三岛由纪夫事件，指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团体“盾会”会长三岛由纪夫在东京市个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军总监部发表演讲，要求修改日本宪法，使自卫队成为日本真正的“国家军队”，以“保卫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然后剖腹自杀。

[4] “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

#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 统一的设想<sup>〔1〕</sup>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一九八一年九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sup>[2]</sup>的内容和一九八三年六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sup>[3]</sup>，消除误解。

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sup>[4]</sup>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结。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话的要点。

[2]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叶剑英发表

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是：“（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3] 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邓颖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她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我们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祖国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只有在现实基础上的真正统一，才能带来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深切希望台湾各族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一道，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献计献策，共商国是。在这次会议上，邓颖超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4] 蒋氏父子，指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蒋介石，前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政府总统。蒋经国，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

# 要利用军队的力量来搞建设<sup>[1]</sup>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天津的引滦工程<sup>[2]</sup>建设，军队出了力，多快好省中占了“快、好、省”三个字。各地区都要学习引滦工程。为国家省了多少钱呐！事情办得多好啊！这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就是有些事情只要调动了积极性就好办。不仅引滦工程军队出了力，植树造林军队也出了力，而且成绩不小，其中包括空军飞机播种。这个事情要坚持它几十年。这就是说，要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军队的力量，只要能为国家省点钱的，都可以用上。比如说修路，就可以考虑用些民力，也用些军队的力量，搞义务劳动。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

[2] 引滦工程，即引滦入津工程。一九八一年，北京、天津、河北遭到严重干旱，给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中央决定，加快引滦入津工程建设，把滦河水引入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师和驻天津某师承担了引滦入津的重点工程建设，他们在施工中战胜种种困难，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预计三年完成的工程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 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 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

(一九八三年六月)

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邓 小 平

一九八三年六月

# 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活动展览题词

(一九八三年六月)

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邓小平

一九八三年六月

## 日本拥有自卫力量 应该有一个限度<sup>[1]</sup>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

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应该拥有它的自卫力量，但应该有一个限度。这是根据当前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日本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进一步提出成为政治大国，这也可以，因为它的经济力量使它在世界上有发言权。然而它又进一步提出成为军事大国。这个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了。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说还是在自卫范围内，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声明。前几年，我同日本的政治家说过，中国不反对日本增强力量，老实说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超过了一定限度就难讲了。一千海里现在还没有形成政府的政策，如果形成政策，不但中国人民，整个东南亚人民都会提出问题的。人们不会忘记过去的历史。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谈话的一部分。

# 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sup>〔1〕</sup>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是随便谈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

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 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sup>〔1〕</sup>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sup>〔2〕</sup>。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sup>〔3〕</sup>。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

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雄心壮志。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日子就会比较好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之，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南北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或称南北问题。

[3] 南南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人们习惯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称为南南合作。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全国同胞们，同志们和朋友们！

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这个光荣时刻，我向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保卫祖国安全而奋斗的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党的十二大<sup>〔1〕</sup>提出，到二〇〇〇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

值，要比一九八〇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我国的对外政策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sup>(2)</sup>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同我国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一样。现在国际局势并不太平，我们必须巩固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 and 能力。

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中华民族的心坎。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 注 释

[1] 十二大，即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李先念致闭幕词；叶剑英、陈云作重要发言。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一九八一年到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西亚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

#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sup>[1]</sup>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

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sup>[2]</sup>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一九九七年以后，在座的六七十岁的人，那时精力就差些了，但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年轻人有优势。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

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

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我跟英国人谈的时候，也讲了在过渡时期希望不要出现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英资带头往外撤，一个是港币发生大的波动。如果储备金用尽，港币贬值，就会发生动乱。过渡时期我们不过问储备金行吗？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如果把土地卖光用于行政开支，把负担转嫁给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政府，不干预行吗？我给英国人讲了五条，他们表示愿意采取合作的态度。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

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国际上对联合声明反应还是好的。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会不会发生变。只要香港同胞团结起来，选择好的政治人物来管理香港，就不怕变，就可以防止乱。即使发生乱，也不会大，也容易解决。

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总之，协议签订后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我们过去讲过，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新情况、新问题。坦率地讲，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但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合情合理地处理。上面讲的这些意见，请大家回去后，向香港各行各业五百万人做点解释工作。

我希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国家的面貌，看看国家的变化。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一九九七年

政权顺利移交作出贡献。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2〕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指中英两国政府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就香港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于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草签，十二月十九日由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三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从此生效。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有：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香港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国政府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内不变。协议还就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

#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sup>〔1〕</sup>。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

低。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难解决。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sup>[2]</sup>，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sup>[3]</sup>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

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

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sup>[4]</sup>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它把台湾当作它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sup>[5]</sup>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sup>[6]</sup>。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

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讲讲国内问题吧。我开头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四年的时间，

“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它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现在我们是捉襟见肘，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得很。至于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住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

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从现在到二〇〇〇年，还有十六年，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sup>[7]</sup>时候，郑和下西洋<sup>[8]</sup>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sup>[9]</sup>，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sup>[10]</sup>，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

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sup>〔11〕</sup>，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

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这次的好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

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了，所以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sup>[12]</sup>同志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他们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可能称职了。他们脑筋比较活。整党明年就要推进到基层，到各单位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才五十几。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解决得不够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

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总之，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 注 释

[1]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2]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建议。这十四个沿海城市是：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3] 撒切尔夫人，即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〇年任英国首相。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曾两次以首相身份访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访华时同中国政府总理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4] 蒋经国，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

[5] 卡特，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任美国总统。

[6]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

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力量”。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7] 明成祖，即朱棣，明朝第三代皇帝。一四〇二年至一四二四年在位。年号“永乐”。

[8] 郑和，曾任明朝内官监太监。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间，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出使亚非各国，遍访东南亚、印度洋及红海沿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史称郑和下西洋（明代称今文莱以西海域为西洋）。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9] 康，指清朝第二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康熙，乾，指第四代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乾隆。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澳门（后改广州）、漳州、宁波等地为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后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境内进行非法活动，而日趋保守的清政府仅从消极方面采取防范措施，于一七五七年关闭广州以外各沿海口岸，并制定了许多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10]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朝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同人民群众一道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朝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11] “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sup>〔1〕</sup>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我想谈一谈顾全大局的问题。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确实是生气勃勃，一片兴旺。外国很多人都这么看、这么说。出现这种局面是最近五年，特别是最近三年，也就是农村政策见效以后，这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这次能够摸“老虎屁股”，进行城市改革？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我们预料到这点。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物资比较多，群众一看，又稳定下来了。我们党的十二大<sup>〔2〕</sup>确定的目标是翻两番，现在看来肯定能够实现。翻两番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不算多，叫做小康水平；但是就总量来说，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元哪！国家的力量大了。翻两番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

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发展起来会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就是说，很有希望。中间也可能会出些问题，不要紧，我们不怕，一步步走，一步步地总结经验，不对头赶快改，不是大改，大的方针不会变了。

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再一个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这方面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sup>[3]</sup>。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这方面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余秋里<sup>[4]</sup>同志告诉我，现在军队的养猪专业人员，一到地方就有用处，司机到地方是最受欢迎的。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

一些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

在座的同志要教育我们各级干部，关心国家大局，就是使我们国家在二十年内发展起来，实际上从现在到二〇〇〇年，没有二十年，只有十六年了。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 十二大，即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李先念致闭幕词；叶剑英、陈云作重要发言。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一九八一年到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3] 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正：“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一九八三年六月，邓小平又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4] 余秋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 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sup>〔1〕</sup>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这次阅兵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但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这表明我们军队高层领导老化，这种状态不改变不行。一个八十岁的人检阅部队，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恐怕是没有的，只此一家。我们军以下干部调整得比较好，比较年轻，当然还要继续调整。最近从工作和作战当中，发现了一些能干的年轻人。我们说的所谓干部老化，是指军级以上，兵团级以上，这就涉及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这件事情还得我们在座的人来解决。过去我讲过多少次，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在部队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对部队是交不了账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件大事。

这件事情，过去我们说五年解决，已经过去三年了，现在剩下两年，看来完成不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讲一个五年呢？五年恐怕太长了。我是搞“五年计划”的，这个“五年计划”不包括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工作，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希望越早交出越好，现在看来现实不允许。所谓不允许，就是要在当军委主席期间，争取解决我们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这个问题太大了。中国人在国际上有这么一个声誉，能够对付最复杂

的情况，解决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方面的工作闯出了声誉，国际上哪怕是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不说佩服。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到现在五年时间，三年就见效了。这次三中全会又作出全面改革的决定<sup>[2]</sup>，说是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全面改革。这是够大胆的。如果说在这方面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声誉，确实把中国搞好了，比我们预想的要快要好，那末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落后的是军队。军队高层干部老化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也是六十四五岁。总部领导有几个年轻的？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过五年就七十多岁了。这怎么行呢？最近在边境打那么个小仗<sup>[3]</sup>，师长上火线负重也不轻哪。在座的各位去试试看，我是不行，你们有这个本事啊？恐怕都不行了。军队有个特点，就是要壮，壮就得年轻，年轻才力壮嘛！

过去说过，我们在座各位的任务，就是找接班人。人，有没有？有。过去我们讲台阶，按部就班地搞，现在恐怕要修正一下，要破点格。凡是看准了的人，要大胆地提拔上来，我们帮他。有的是在实战当中表现出来的，有的是在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不是说过要开个单子嘛，有没有啊？明年为什么要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要是选拔一批年轻人进中央委员会，当然还有别的事情。要后继有人，这是一个战略安排。人有的是，不是没有人，就是要去选，去物色，物色准了，就把他们放到重要的或者更重要的岗位。现在关键是高层，是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干部。一个是提，一个是让。我们希望军队出现一些“开明人士”，起带头作用，没有“开明人士”不行。全国干部老化的问题，突出的是军队。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解决。怎么解决？这次座谈会可以谈谈，军委也要好好研究。问题要解决，哪怕走一步也好。这一步就是三总部、大军

区、军兵种在两年时间内，能不能找一些五十岁左右的人，如果能找到四十岁左右的更好。找太年轻的恐怕现在还困难。六十岁的人干得了多久？干十年就是七十岁。我们要物色一些五十岁稍微出头的人，在实际工作中筛选，两年至迟三年时间加入这个行列。五年以后，我们主要的高层领导人最好能够在六十岁左右。外国军队六十岁的人已经退休了，我们讲六十岁左右，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的。一下都年轻化恐怕不行，但是晚了也不行，还是老中青三结合，用这种交替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老一点的人，有一部分就应该让出位置来，用一些方式，顾问委员会的方式或者退休的方式，主要是退休的方式。最近我在顾问委员会也讲了退休的问题，我们的根本制度是退休制度，不是顾问制度。顾问制度是一个过渡形式。大家研究一下：一、这个想法对不对，二、如果这个想法对，有没有希望做到。讲改革，这是最大的改革，也是最困难的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在这方面走得比我们军队快。现在的副总理、中央委员里边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人，比较能干，能够胜任。他们这个年龄比我们当时这个年龄的水平高一些，首先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一些。年轻人提起来，我们要信任，要相信他们比我们能干，当然还要帮。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消肿。这个话讲了快十年了。消肿一直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现在能发动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但是这两家都不敢动，哪一家都有毁灭世界的的能力，谁敢动啊？这里还要讲中国现在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

个政策很重要。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对外政策的作用。所以现在讲裁军、和平，我们有这个分量，有这个资格。我们现行的政策，最有力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

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在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讲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确实如此啊。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提高军队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消肿，提了多少年了，但效果不大。抗美援朝以后，我们军队曾经减到二百几十万人。二百几十万人就显得我们国家力量弱了？并不是说人少了就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弱了，那个时候并不弱嘛，人家也并没有轻视我们。我们有这个历史嘛。我们的军费开支数目不算大，但是对我们也是一个负担。现在减人，是为了更多地节省开支，把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所以要提出进一步裁

减，减少一百万人。因为减少一百万人也能足够应付意外的事件。我们军队肿在哪里？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当然部队也多一点，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第一是三总部。总政人少一点，但也有点肿，也得减，减的有限就是了，主要是总参、总后。军兵种也不能说不肿。空军的人数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一个。海军不强，但也肿，因为我们舰艇只有那么多嘛。国防科工委现在那么大的机构，这还不叫肿啊？再就是我们的 大军区，每个都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人多得不得了。所以说，消肿主要是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减一百万人，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减了以后这些机构的效率肯定会提高。那时候，我们军队蓬蓬勃勃的兴旺气象就会真正出现。

这几天座谈，大家都很赞成减到三百万人这个方案。减到三百万人，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这件事情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我们军队有个特点，就是行动快，有这个传统嘛。最好不要超过三年，拖长了不利。一年半、两年能够完成就很好。

精简还要联系到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刚才说的，提一批年轻同志到领导岗位，老同志让出一些位置来，没有这条不行。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是要撤掉一些大军区，保留六个、七个。还有一个怎么设置的问题，撤哪个，并哪个，这个问题比较好办。

军工体制怎么改革，我们还没有最后决定，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比如，几个机械工业部，除了二机部、七机部以外，应该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要结束另外一个天地的时代。这不会妨碍军火生产，你给他任务嘛。我讲了好几年了，军火生产改成订货关系。将来恐怕必须是这样。因为一搞责任制，你不搞订货关系，怎么行呢？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

这些设备、技术、人才综合利用起来，效益不止成倍增加。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一个全局问题。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再犹豫了，拖一天就损失一天。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3〕指一九八四年四月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边防部队收复和保卫老山、者阴山的战斗。

#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 世界的两大问题<sup>〔1〕</sup>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

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和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險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

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險。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險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sup>[2]</sup>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sup>[3]</sup>。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

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所以，我认为日本企业界对发展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态度，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决策。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大平正芳，日本自由民主党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初步构想。

[3] 南北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或称南北问题。

#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在这么一个重要会议上，我想先就裁减军队这件事情，讲几句话。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消肿”，比较难的是安置退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杨尚昆<sup>〔1〕</sup>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妥善的办法把它解决好。这次军委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想到一块儿了。在这方面，我看没有不同意见。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同志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来看问题的。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讲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这个问题同我们会议也有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sup>〔2〕</sup>，“山、散、洞”<sup>〔3〕</sup>的方针在内，

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最后我再讲一点。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 注 释

〔1〕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

〔3〕“山、散、洞”，是“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为防备侵略战争，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国防尖端项目要搬到三线地区，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建设，有的还要进山洞。

# 中国反对“星球大战”计划<sup>[1]</sup>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

当“星球大战”计划<sup>[2]</sup>出现时，中国就表示反对。美国人说苏联人早就开始搞了。我们的观点是，不管谁搞，我们都不赞成，都反对。这个观点我曾通过撒切尔夫人<sup>[3]</sup>转告了美国领导人。我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是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不是一般性升级。空间军备竞赛比地面军备竞赛更厉害。“星球大战”计划将导致军备竞赛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星球大战”计划，即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该计划旨在研究和发展以太空为基地，对来袭的弹道导弹和重返大气层飞行器进行多层拦截并加以摧毁的系统，使敌方核武器丧失威力，在军事上取得高技术竞争的优势。

[3] 撒切尔夫人，即玛格丽达·希尔达·撒切尔，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〇年任英国首相。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曾两次以首相身份访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访华时同中国政府总理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 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批示<sup>[1]</sup>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月)

—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紫阳<sup>[2]</sup>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来信上的批示)

二

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一九八六年四月六日在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渝的报告<sup>[3]</sup>上的批示)

三

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

耀邦、先念、陈云<sup>[4]</sup>同志审核后，提政治局讨论，批准。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报告上的批示)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有关跟踪高技术发展建议和报告上的三个批示。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这个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一九八七年三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又为全国“八六三”计划会议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2〕紫阳，即赵紫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3〕报告汇报了对选择高技术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的不同意见。

〔4〕耀邦，即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 发展高科技要急起直追<sup>[1]</sup>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

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和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但是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美国搞“星球大战”<sup>[2]</sup>，欧洲搞“尤里卡”计划<sup>[3]</sup>。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大，它代表了科学知识的飞跃前进。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工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搞。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在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星球大战”，指“星球大战”计划，即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该计划旨在研究和发展以太空为基地，对来袭的弹道导弹和重返大气层飞行器进行多层拦截并加以摧毁的系统，使敌方核武器丧失威力，在军事上取得高技术竞争的优势。

[3] “尤里卡”计划，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的一项科技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欧洲国家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缩小西欧国家在高技术领域与美国、日本的差距。这个计划得到了西欧各国的支持。

# 将军工力量纳入整个 经济发展范围<sup>[1]</sup>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我们的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军工力量不纳入整个经济发展范围，是极大的浪费。军工企业的人才、设备都是好的。这个力量用不上，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利，对国防建设也不利。因此，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要在第三季度完成军工几个部移交给国务院的工作。这件事关系到明年计划的安排，不能再晚了。这也是改革。

注 释

[1] 这是国务院负责人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传达的邓小平关于军工体制的意见。

## 悼 伯 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sup>〔1〕</sup>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一九一五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二十二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

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长征开始前，他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长征一开始，伯承率五军团担负了最艰巨的殿后任务，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恶战，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后来他又担任先遣司令，率领部队斩关夺隘，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对张国焘<sup>[2]</sup>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长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语，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

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伯承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大陆解放不久，他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

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伯承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拯民于水火”，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使伯承从旧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清楚了，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除了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别无他途。伯承在一九二四年就接触了共产党人，但他没有马上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在经过了两年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之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九四二年冬天，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的同志祝贺伯承五十寿辰的时候，他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他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世的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回顾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

## 注 释

〔1〕 伯承，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今属重庆）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和邓小平一起率部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八月七日向大别山地区挺进，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2〕 张国焘，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共产党，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

# 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sup>〔1〕</sup>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

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

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的节录。

# 警惕日本极少数人 复活军国主义<sup>[1]</sup>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

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日本很多朋友，包括政治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很多人都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做了很多事情。宇都宫德马先生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掘井人”之一。在座的朋友都是搞了几十年中日友好工作的。就中国人民的心情来说，是希望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也是愿意中日友好的。

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的

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日本国会参议员、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谈话的一部分。

# 为建军六十周年题词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邓小平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 对南沙群岛问题 中国最有发言权<sup>[1]</sup>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六日）

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国际上很长时间对此并无异议。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海军舰队去南沙群岛海域巡逻，随即对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派了驻军<sup>[2]</sup>，并修了一个小飞机场。当时联合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世界上有权威的地图标明南沙群岛一直为中国所控制，菲律宾舆论界也提到过这一点。我对劳雷尔副总统说过，中菲两国友好，这个问题可搁置一下。

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中国有权提出这种建议，只有中国建议才有效。这样就没有争端，用不着使用武力。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毕竟是个麻烦的问题，应通过协商找到对和平有利、对友好合作有利的办法。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十月组成进驻西沙、南沙群岛舰队，以林遵为司令官。十一月，林遵等率永兴、中建、太平、中业四艘军舰分赴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接收，并在主岛立碑纪念，派兵驻守。随后又重新命名公布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及其各个岛、礁、沙、滩的名称。

#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 领域占有一席之地<sup>[1]</sup>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sup>[2]</sup>。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sup>[3]</sup>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

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

[2] 高科技发展计划，指《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这个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一九八七年三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

[3] 李政道，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一九七二年后多次到中国访问、讲学。

##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sup>[1]</sup>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sup>[2]</sup>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我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我国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我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sup>[3]</sup>。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我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我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

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sup>[4]</sup>。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sup>[5]</sup>，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sup>[6]</sup>，后来还有越南战争<sup>[7]</sup>。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

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话的一部分。

〔2〕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殖民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朝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同人民群众一道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朝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3〕“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满洲国”，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满洲国”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

〔4〕十九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一八五八年，通过中俄《璦琿条约》，迫使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一八六〇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划归俄国。这一条约还确定了中俄西段边界的基本走向，为沙俄掠夺中国的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一八六四年，沙俄依据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沙俄又通过《中俄改订条约》（亦称《伊犁条约》）及其续签的五个子约，再次

侵占了中国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样，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总计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5] 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指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是，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方面承诺维持外蒙古现状；恢复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苏联则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6]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7] 越南战争，这里指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控制越南南方，阻挠越南南北方统一。一九五九年后，越南南方人民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反抗美国扶植的独裁政权和美国的干涉。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并于翌年三月出兵南越。在越南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被迫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美军撤出南越。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

#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 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sup>[1]</sup>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

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

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sup>[2]</sup>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

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日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sup>[3]</sup>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sup>[4]</sup>，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

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

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是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 注 释

[1] 指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2]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次全会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3] 十三大，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选举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

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四个保证”，指一九八〇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的，在八十年代里需要做好的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

##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 中国大有希望<sup>〔1〕</sup>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sup>〔2〕</sup>，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总之，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这次常委中有老的，有比较年轻的。当时我说，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sup>〔3〕</sup>选出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

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这次事件<sup>[4]</sup>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现在过了三个月，如果到五中全会<sup>[5]</sup>正式作出决定，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我同杨尚昆<sup>[6]</sup>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你一生是什么样子，你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我反复考虑，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些形式，比如追悼会，开得那么多，花的人力物力不少，也可以简化一下。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确实都有功劳，也总有一些失误，但一讲都是功劳。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

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sup>[7]</sup>，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sup>[8]</sup>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第三个问题，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这次动乱中看得更清楚。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五中全会上我辞职后，要有新的军委主席，军委也应该有些变化。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总之，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今天常委的同志都在，我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

我们在两三年内要好好地调整。过去失误的，例如通货膨胀，弥补起来。最近我看到学生的现象是可喜的，他们真正在反思，是个大教育啊。问题是很多，但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对文艺战线再加以整顿，整顿书刊市场照现在的部署坚持下去，会变的。我们的目标是“四有”<sup>[9]</sup>。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我们这个军队也好啊！尽管现在换了一些年轻人，军长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这个军队确实保持了好传统。

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在历史上，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这几年我们出现了两个领导人更迭以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核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关于工作方法，我提一点：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做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sup>[10]</sup>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

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战争年代形成过山头，当时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觉悟，靠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没有形成什么派。就是那样，山头主义也有影响，所以专门反了一次山头主义。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调动一下。

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

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2〕这里指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意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仍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3〕四中全会，指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分析了五、六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会认为，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撤销赵紫阳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4〕指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

〔5〕五中全会，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指出，邓小平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6〕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7〕这里指《聂荣臻回忆录》一书，一九八三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上册，一九

八四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下册。

〔8〕这里指李维汉撰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一九八六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9〕“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0〕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一九八〇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sup>〔1〕</sup>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

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 小平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 注 释

[1] 十三届四中全会，指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分析了五、六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会认为，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撤销赵紫阳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最近一段时间，我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我离开军委领导岗位的时候，也应该跟大家讲点话。我的话很短。

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再一点就是，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谢谢大家。

##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sup>[1]</sup>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sup>[2]</sup>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sup>[3]</sup>，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sup>[4]</sup>。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sup>[5]</sup>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sup>[6]</sup>。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sup>[7]</sup>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sup>[8]</sup>等。那

时宋任穷<sup>[9]</sup>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sup>[10]</sup>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sup>[11]</sup>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sup>[12]</sup>，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

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sup>[13]</sup>、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sup>[14]</sup>，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sup>[15]</sup>，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赢。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

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趋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

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干<sup>[16]</sup>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sup>[17]</sup>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

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sup>[18]</sup>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sup>[19]</sup>。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sup>[20]</sup>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sup>[21]</sup>、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

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sup>[22]</sup>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sup>[23]</sup>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〇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

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2] 刘伯承，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

[3]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山西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解放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展开自卫反击，进行了上党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

[5] 马法五，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月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总司令。

[6] 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新乡一带沿平汉路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部队三个军到达磁县、邯郸以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军区部队围歼。全役共毙伤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一万七千余人。

[7] 李达，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8] 陈锡联，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行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冀南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9] 宋任穷，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所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后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10] 苏振华，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11〕 汤恩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曾统辖高树勋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九集团军。

〔12〕 王定南，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到高树勋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

〔13〕 杨得志，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14〕 彭涛，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15〕 谢富治，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16〕 王宏坤，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桐柏军区司令员。张才干，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

〔17〕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8〕 秦基伟，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19〕 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负责领导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行动，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这次战役击毙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官黄维、兵团副司令官吴绍周，共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20〕 王近山，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杜义德，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

〔21〕 杨勇，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2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理长官职务，主持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宜。

〔23〕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 始终放在第一位<sup>[1]</sup>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

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你们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患难见真情。虽然我们并不算处于患难之中，但你们此时来我国访问的真情是可贵的。现在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比要制裁我们的人多得多，我们没有孤立感。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件<sup>[2]</sup>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

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

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sup>[3]</sup>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前不久尼克松、基辛格<sup>[4]</sup>来中国访问时，我对他们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其实这个话早在这次事件发生前我就对美国人说过。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我们总结的另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把过去某些方面的失误认真地尽快地纠正过来。思想工作要加强。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经济工作要整顿，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

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关注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你们的勇敢行动证明，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谈话的要点。

[2] 指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

[3] 巴黎七国首脑会议，指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由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十七日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横加指责，施加压力，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人民日报》于七月十七日以《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

[4] 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任美国总统。基辛格，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

# 振兴中华民族<sup>[1]</sup>

（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去年发生动乱<sup>[2]</sup>，当时我们控制了局势，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曾经请人转告布什总统，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sup>[3]</sup>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sup>[4]</sup>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联合国的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大陆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比如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六千万吨，还有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的一部分。

[2] 指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

[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指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由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十七日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七国

首脑会议“对中国横加指责，施加压力，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人民日报》于七月十七日以《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

[4] 八国联军，是一九〇〇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而发动侵华战争所组成的联军。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同时，俄国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清朝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

#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sup>[1]</sup>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一日）

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

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sup>〔2〕</sup>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的

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

# 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sup>〔1〕</sup>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五日）

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谈话的一部分。